

六四 35 周年随想——谁真的爱自由？

骆远志

引言：猎人抓猴子

1980 年代初，邓小平已清除毛泽东遗党江青集团，成为中国新独裁者，并喊出“改革开放”口号，在东西方冷战中投靠美国，为中国争取来发展空间。当时中国各方面还不如北朝鲜。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落后，老百姓极端贫穷，思想闭塞，既对世界最新科技、经济、文化、艺术等无知，也丢掉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祖宗传统。社会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对政治敏感，并且头脑里只剩马列毛著作里的教条。从中南海到市井百姓都懂，保持这种封闭状态，对于毛之后中共继续执政，至关重要。

但投靠美国就必须打开国门。最初只是一条缝，却还是激起大众强烈好奇心。社会上下都渴望了解西方，让中央左右为难。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增加与西方交流。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流入国内，势必威胁官方意识形态。在两难处境中，对外开放运动展现强烈选择性。西方严肃思想被禁止，包括基督教信仰、哲学、政治等作品。1980 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目的都为此。但讽刺批判西方社会的作品、家庭肥皂剧、科普类作品等，被大量引进，每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个例子是《动物世界》，属科普类影视作品，不涉及政治制度，所以被无障碍放行。《动物世界》分成很多集，经常由西方顶级科学家与顶级摄影师联手制作，真实生动，非常受欢迎。电影院和电视上都播放，频繁程度会令今天的观众惊讶。我当时是个三线城市里的初中生，电视里很少有好节目，所以很喜欢看《动物世界》。其中多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这里讲一个。

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大沙漠，原始人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沙漠干燥炎热，水是人类与动物们争夺的关键资源。故事有两个主角。一个是中老年原始人，平凡无奇。另一个是矫健的猴子，非常聪明，学名叫非洲狒狒。原始人急需水，不知道水源地，但知道猴子知道，所以要抓猴子，然后逼它带领自己找水。



图1. 原始人年老力衰，猴子年轻力壮、聪明机警。但猴子还是体量小，打不过原始人。为捕获猴子，原始人正在土堆上设置圈套【1】。

故事开始，原始人找到一个土堆，慢条斯理地在上面打个洞穴。洞肚子稍大，可容纳猴子的拳头；但开口很小，猴子手可以通过，拳头不行。原始人在洞里放置一些食物。在这个阶段，原始人还没看到任何猴子，但知道肯定有猴子藏在暗中偷看自己。他设置圈套，完全是场阴谋，故意选在显眼的地段，动作缓慢，就是让猴子发现自己。猴子的嗅觉、听觉、视觉都非常敏感，远超人类。并且猴子充满进取心和好奇心，只要给它机会，它一定会发现人。

设置好圈套，原始人躲到树后静待。不久，猴子从暗中现身，小心翼翼地走到洞穴前，将手伸进去抓食物。这时原始人跑过来。猴子看到人，惊恐大叫，拼命挣扎，试图逃跑。但它舍不得手里的食物，一直不松拳头，造成拳头被卡住，只能束手就擒。被捕后，猴子知道打不过人，恐惧之下乖乖松开拳头，放弃食物，全忘了几秒钟前就为了这点食物，它放弃了自由。



图 2. 上左上，猎人暗中等待。上右，猴子见人跑来，大声嚎叫，激烈挣扎，但拳头被卡住。上左下，口小肚大的洞穴卡住猴子的拳头。下，人把绳索套在猴子脖子上，猴子还在大叫，但还是乖乖松手，然后被牵走。影片原名为《Animals Are Beautiful People》【1】。

那时我大概 13、14 岁，看完这个片段后被震惊，觉得猴子怎么这么傻？发现人了，它为什么不松开拳头跑掉？不被抓，它还有自由，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找吃的。被抓了，绳索套在脖子上，连生命都被人掌握，相比之下那点食物又算什么？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影片，发现这种抓猴子的办法，在非洲已有千百年历史，一直灵验。



图 3. YOUTUBE 上一段拍摄于 1912 年的影片。欧洲殖民者观察到非洲土著人用空葫芦内装食物诱捕猴子，与图 1 中的方法大同小异。从左到右，土著人在葫芦上开有小孔，把食物发在里面，然后挂在树上；猴子手伸进葫芦，抓住食物不松开，被锁住；殖民者在土著人指导下抓猴子；拍摄者感叹、并发问，猴子被抓，是因为贪婪还是因为愚蠢？【2】

第一章 学运领袖们不懂自由

回顾六四

1989 年 4 月中，胡耀邦去世。一两天内，北京等地大学生走上街头，喊出政治口号，包括反腐败、要求自由民主等。我恰巧因私事正在北京。从一开始，街头巷尾的人就传说，学运背后有中央高层支持。很快全国人都知道，支持的人就是总书记赵紫阳。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学和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学校里的学运领袖们，原本都想当官方的学生干部，但因各种原因落选，现在趁学运又跳出来，觉得是一条向上爬的新路。在 1980 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终将走上西方式自由民主之路，自己早点跳上这条船，对未来前途有好处，包括有机会进入政界。每代大学生里都有一部分人，心怀强烈愿望搞政治，俗称想当官。在北京的大学生里，这种情况尤其普遍。

我很快回到上海，见证了交大最早的学运。开始时，激动的学生们自发上街游行，严重缺乏组织。之后出现多股学生小团伙到各宿舍游说，试图获得大家信任，建立交大学生自治会。领头的大概被称为“主席”或“召集人”，后来多次更改。大家并不注重，只称其为“头头”、“头儿”、“总招”等。

记得第一位交大学生自治会的总招是个研究生，看上去像个中年人，入学前曾在内地省份工作多年。他和一两位推崇他的同学来到我们宿舍拉票，在狭小的空间里侃侃而谈，声音很大，口音很重，传到走廊里，周围宿舍的人也好奇，伸头进来查看。他的竞选演说主线

是，他工作时的领导很卑鄙，在安排工作和分配福利时不公，恶劣程度让人难以置信，造成他怀才不遇，甚至无法在单位里继续生存，所以才发奋考研究生逃离。进入交大后，研究生班的指导员在选拔班长时又非常不公平，内定人选，造成他没有被选上。所以这次学潮来临，他不顾危险站出来，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他讲完了，同学们没啥反应。他起身要走，我问他你要如何领导未来学潮？他盯着我，带着肢体语言，坚定而大声地说，“游行！示威！”我说如果政府不理睬呢？他说，“那就再上街游行，直到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然后转身离去。

他做总招没几天就不出现了，听说被校方找去谈话，威胁他如果继续做下去，将影响他毕业分配，于是他选择隐退。在他之后出现一连串总招和自治会领导班子，其中每个人都受到官方威胁和父母劝阻，但总体讲越来越勇敢，组织才能也越来越好，比如在群众面前说话更有条理，与政府高层对话时不怯场等。有一两位我还有清晰记忆，当时勇敢坚定，一直坚持到 64 前夕。但我不想提他们名字，因为他们仍在国外，早已远离自由民主运动，以工作或经商谋生，不想再提当年。

我和身边几个同学注意到，这些学运头头们都有超乎寻常的政治野心。比如有人明讲，自己想当中国的华盛顿。现在说起，可能显得可笑。但同学们还年轻，理想特别远大也不是坏事。更多人想当官，越大越好，比如希望今生能当上主席、总理、或省长、部长等。他们一本正经，完全不是开玩笑。在历史上，交大毕业生做大官的不算少。他们如此计划人生，并非全是幻想，也有自己的道理。

关于学运，他们的想法都与第一位总招相似，单薄简单、直截了当。自治会自始至终的主线就是游行、游行、再游行，并没有其他点子。他们希望学生们把事闹大，最终逼政府屈服，让改革派全面掌权，然后中国开始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基于这种认识加入学运。但我很快发现，他们的组织能力并不比一般同学更高明。学生自治会前后各个总招、以及几乎所有主要干部们，本来都想当官方的学生干部，但正常时期没当上，学运来了就站出来加入学生自治会，所以缺乏组织经验。在这点上他们又与第一位总招类似。

关于中国自由民主面临的困难，他们的理解甚至不如很多一般同学。比如我当官方学生会干部时，就耳闻交大校级和各系领导层里都有民国时期的地下党，当年对自由民主满腔热忱，但 1949 年后被党怀疑，不得重用，宦海之路止步于学校，文革时又挨整等。学运前就有朋友私下谈及，共产党比国民党狠多了，这些地下党自作自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学运开始时我心里有很多疑问，眼前的学生运动与民国时的有什么不同？如何能相信这次不像当年那样，学生闹来闹去，最后换来更严重的独裁专制？我接触到的自治会成员们似乎全然不知道这些问题。他们因无知而乐观和无畏。

我主动加入 89 学运，深究原因，我的家族历史与父母经历让我从小体会到社会在根本处严重不公。但在当时，这只不过是一种感受，我还讲不清楚具体。至于自由民主，我也不懂其

深意，只觉得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更先进，就是因为他们制度好。苏联和朝鲜等国落后、对老百姓残忍，与共产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制度与苏联和朝鲜一脉相通，所以应该被抛弃。中国应该向美国和西方学习，实现自由民主。

我们这届大学生经历过 1986 年学潮，结果造成胡耀邦下台。86 学潮主要发生在合肥和上海。我当时置身事外，因为觉得那是大学生对党中央 “撒娇、要糖吃”。1986 年时，中国还基本保持苏联式制度。大学包分配，高年级同学都预计将进入国家编制，很在乎学校对自己的评语、自己的档案内容等，所以不敢言行出格。很多人积极争取入党，学生里的主流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权者一致。他们与当权者之间的争执，只关系共产党执政的细节，不可能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

从 1986 到 1989 年，中国变化很大。社会各方面向西方学习，远离苏联模式。一批知识分子喊出 “全盘西化” 口号，包括方厉之和刘晓波。校园里也换了格调，学生们不再只想进入体制，更向往毕业后出国留学，或受雇于外资企业。89 学运到来时，我读大学四年级，最初并不积极。但游行队伍喊出自由民主口号之后，很多同学私下里明确表达对中共体制的鄙视、和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向往，在我心里产生共鸣，让我觉得这次学运与 86 学潮有根本不同，于是加入。



图 4. 1989 年学运。左，北京大学生抬出 “不自由毋宁死” 标语。中，上海学生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新闻自由。右，89 上海学运一瞥。几乎所有群众运动都包含情绪发泄、年轻人胡闹的一面。

刚加入学运时，我心里有功利思想，觉得如果学运成功了，自己也算中国自由民主的先行者。我的野心大概高过交大一般学生，但不及学生自治会里的平均水平。不过在学运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心中的疑问却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罢课、罢市、游行、喊口号等，到底如何引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我回答不出，所以心里一直有怯，不敢太极端，不敢站出来争当总招。

在我熟悉的老师中、我父母的朋友里，都有民国时期学运积极分子、地下共产党员、党外积极分子等。他们曾高喊自由民主口号，支持共产党，反对民国政府。因为中共当时高举自由民主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被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看成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但

中共执政后，彻底根除自由民主，这些曾经的学运分子们却不再要求自由民主了，反而在几十年里不断对党表忠心。他们的德行和学识都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生活中温文尔雅，为人厚道，不偷不抢，是大家口中的好人。我从小知道和尊重这批人，但稍年长后就近乎本能地知道，他们其实不在乎自由民主，心里最想出人头地，尤其爱当官儿。

现在回想，民国时他们参与学运，根本原因是觉得政府软弱可欺。蒋介石相对尊重知识分子，他们就抓住这点，大肆反蒋，指责他独裁专制。成功了，他们将是社会新贵；失败了，蒋介石也不会拿他们怎样。何乐而不为？1949年后毛泽东鄙视知识分子，对他们毫不手软，比如把右派们发配到夹边沟，饿死在荒野中，还不告知亲人为他们收尸。那些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当然看懂乾坤转变，再不喊自由民主了，更没人谴责毛独裁专制，反而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而且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积极为党工作，党外的都积极入党，因为党是新社会里掌握关键资源的唯一主体。我知道的几位，临终时还对身边家人表示自己坚决忠于党。我感觉他们是真心的，因为他们真心希望身后的官方评价更高一点、家人和孩子们得到更好一点的照顾等。他们的每个心思、每个动作都瞄准现实利益，可以说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物欲的气味。他们当年支持自由民主，根本目的其实也是利益，不是自由民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民主只是一种夺权手段、或个人晋身的敲门砖而已。



图 5. 1949 年前的学运。左，五二〇运动。1947 年南京金陵大学校门上的标语，“保障人权”。中，交大学生拦火车。校史中著名事件。1947 年 5 月，交大学生扒铁轨、拦火车，然后学生驾驶火车去南京请愿。右，1948 年交大学运，在上院和中院草坪上树立“民主堡垒”塔。

89 学运期间，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交流，大家都觉得不懂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其中一位说，我们不懂，但肯定有人懂。赵紫阳身边有那么多智囊。顶尖的文科大学、社科院、《世界经济导报》社里有那么多专家，一辈子研究这类东西，他们一定懂。我们只要出力就行。当时大家都理想主义，愿意为中国自由民主做马前卒。

学运后期，压力越来越大，学生自治会和整个自由派内部都变得混乱。作为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干部，我曾代表交大与上海其他高校、社科院、上海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接触。他们几乎都是中年人，极少数老年人，个个精明，对现实政治的算计远超我想象。但让我意外的是，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他们竟然没有答案，并且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与我身边同学们一样。没答案他们也不着急，看似漠不关心，在这点上还不如我身边同学。

这些成年人只把运动看成另一次政坛洗牌，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上位，非常关心中央每日动态，开了什么会、谁都说些什么、谁上谁下等。但除了喊些空洞的口号，他们并不关心运动的自由民主内涵。我当时已看出这批学运领导群体不可能带领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在心里遇到神，与神对话。之后我继续参与学运，不愿离开或屈服，就是基于内心对神的认识。政府言行蛮横无理，最后开枪杀人，违背基本道义，我无法苟同。无论这场运动成功与否，我都想坚持到底。

六四的失败与成功

六四喋血已过去 35 年，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不但没进步，反而大幅退步，独裁专制回潮。这是每个胸怀自由民主理想的六四学生、以及每个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想躲也躲不开的憾事，让人痛心疾首！更重要的是，在六四前的 1980 年代后期，人们感到自由从无到有、由少变多，所以对未来充满希望。但现在大家觉得自由越来越少，未来中国将更加专制独裁，让人无所期待。



图 6，对比 2018 年习近平修宪与 1915 年袁世凯登基。习近平修宪已过去 6 年，全社会万马齐喑，独裁显得越来越稳固。而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上下公开反对。袁敌不过民意，83 天后不得不退位。左，全国人大共约 3000 名代表，几乎一致投票同意修宪，让习近平成为事实上的终身领导人。中，反对皇权复辟的护国军从昆明出征。1915 年底袁世凯登基。几天内，护国战争开始。右，护国军几位重要领导人。从左到右：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𤩽、李烈钧。

审视六四前的中国。在 1970、80 年代，中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家都失去了生产资料和贵重生活资料所有权，即使社会精英阶层也很穷。比如 1985 年我来交大、到 1989

年学运前，在中国最富有的上海，一个典型四口之家，即使父母是大学教授、医生、高级技术人员等，家庭月收入也只有 100 到 200 元，住房等属公家所有，没有汽车、电话等贵重物品。而一个住校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就要 40—50 元。可见大家都很穷，除了基本吃穿，没什么余钱。按马克思理论，当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每个人都属于统治阶级，政权应该为每个人服务。但北京的枪声无可辩驳地否定了这点。不，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即使你按它的要求变得很穷。

在同期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正探求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改革。六四屠杀却造成那里的民意发生根本转变。他们看清共产党与人民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党可以为自己利益，不惜杀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于是东欧人民开始要求抛弃共产主义、加入西方自由民主阵营、回归传统基督教文化。六四后短短几年里，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崩溃，无一幸免。中国六四事件是东欧剧变的导火索，很多中国人至今不清楚这点。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虽然中国让他们失望了，但他们溅起的火花在遥远的欧洲点燃熊熊烈焰。希望这个结果可以部分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国名	执政的共产党官方名称	剧变标志性事件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共产党	1991年12月解体
2	波兰人民共和国	波兰统一工人党	1989年12月29日，恢复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3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989年10月23日，改国名为匈牙利共和国
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	1990年10月3日加入西德
5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产党	1990年11月，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6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89年11月取消一党专政
7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罗马尼亚共产党	1989年12月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枪决
8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1990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不断的政治危机中解体
9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991年实行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

图 7. 东欧剧变一览表。剧变前共有 9 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总体军事实力抗衡西方集团，政治影响力延及半个地球。中国六四运动后两三年里，它们全部变天。

第二章 评论六四名人

为什么六四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本质是一回事，对民族未来至关重要。但 35 年过去了，运动中登上国家级政治舞台的自由派领袖们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是重大失职。六四流血，中共是罪魁祸首，但自由派领导层也难辞其咎。年轻人们听信了他们的主张，响应了他们的号召，才上街游行示威，最后造成很多人失去生命。他们有道义责任向中国人民交代，他们计划如何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孩子们的死到底为了什么？

自由派领导层松散，主要可分成三类。一是赵紫阳和他身边智囊团，比如陈一谘、严家其、鲍彤等。二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或被各利益方推崇的民间自由派人士，如方厉之、刘晓波、魏京生等。三是学生领袖群体，如王丹、乌尔凯西、柴玲等。以下简单介绍他们，并附上我的简短评论。

赵紫阳集团

赵紫阳及智囊们是六四学生背后最重要的操纵力量。赵下台后通过多种渠道对外发声，坚称自己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智囊们很多来到海外，也做过类似表态。但这么多年来，从未见他们公布中国自由民主化的具体主张与步骤，也没有关于自由民主重大议题的深入分析等。赵不同于其他人，位至总书记，如果在六四中夺权成功，必须立刻推出属于自己的政策。他手上资源多，有阵容庞大的理论与政策班子，如果当年真计划推行自由民主，就应该早有全面、详细的计划。比如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自由民主必然带来地方权力上升。北洋政府就没处理好，造成各种纷争，军阀混战，最后断送共和。但现在回头看，赵集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且连个影儿都没有，让人怀疑他们关于自由民主的表态都是空头支票。

自由民主、或宪政共和，在中国政治语境里是一回事。前者是现代说法，后者是百年前说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每股政治力量在取得政权前都声称支持自由民主，但在取得政权后都施行独裁专制。这很容易理解。自由民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没权的人自然喜欢。但夺得政权后，自己变成了强者，自由民主就是削弱自己权力，自然不喜欢。1940年代，中共没权，就是国内最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被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群体支持。但夺取政权后，中共施行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最极端的独裁专制。我预测从现在到自由民主实现那天，即使本质上最专制独裁的政治力量，在取得权力之前也会声称支持自由民主。所以看待任何政治集团，包括当前自由派，都不能只听它说什么，更要深入探究它的理念和策略实质。

赵紫阳集团采用了清末戊戌变法的剧本。慈禧垂帘听政，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就以变法为名，拉拢向往西方的新兴精英阶层，目的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寻找机会夺权。慈禧之于光绪，很像邓小平之于赵紫阳。赵也试图用自由民主作口号，抬高自己的声誉，再从邓手中夺权。光绪帝身边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做关键幕僚，赵紫阳则召集了陈一谘、严家其、鲍彤等做智囊。但这些表面的相似却掩盖不住赵集团的严重不足。

首先看国家层次的战略选择。赵集团模仿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模仿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维新之前的日本，对外面临西方列强扩张，内部军阀林立，国家分裂。维新集团推举本无实权的明治天皇成为名义上的独裁者，统领全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强国富民方面，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但在追求人权、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等方面却明显失败。在维新之初的几十年里，日本经济大发展，然后转向军国主义，老百姓失去基本自由，人权经常被

践踏，经济也被拖垮，最后在二战中几乎被灭国。可见，明治维新并非成功的自由民主之路，戊戌变法也不是。赵集团以它们为师，希望强国富民不假，但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计划自由民主。

再看政治操作。戊戌变法造成清末百日维新，然后被慈禧轻易斩断，光绪被软禁。后代人归罪于慈禧，但她并不傻。她阻止戊戌变法，部分原因是她发现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后来北洋政府的失败证明她有道理。在具体操作方面，赵紫阳集团不如清末变法派。变法派施政百日，颁布众多新法。赵集团却从没能撇开邓小平独揽朝纲，更没能将自由民主的主张付诸实际。政治摊牌时，变法派试图依赖实权将领袁世凯，但失败了。赵集团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只得依赖马路上游行的大学生作为自己的暴力基础，与手握绝对军权的邓小平叫板。这是与虎谋皮，他们却真的实施了如此荒唐的政变计划，实为不智。矛盾激化后，赵集团成员纷纷逃跑，留下学生们挡子弹，没一个愿当现代谭嗣同。

最后看思想方面。赵紫阳集团有戊戌变法作借鉴，应该比百年前的人看得更全面、更透彻。但读他们发表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不但没进步，而且还退步了。比如谭嗣同的《仁学》，虽有明显偏驳，但也不时涌出精辟见地。比如其中写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其中“乡愿”代表“看似敦厚老实、实则与流俗合污”。六四前不久我买了本严家其的《首脑论》，实在读不下去。里面全是为赵上位的宣传与廉价权谋，谈不上对政局现状、民族未来、或自由民主理论的任何真知灼见。其他智囊团成员的文字成就也不比严家其更高。他们的思想境界都类似，只知小圈子里的权谋，严重缺乏深刻独到的想法。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
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
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
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 谭嗣同《仁学》

图 8. 谭嗣同(1865—1898)，清末百日维新激进派重要人物，出身官宦家庭，少时接受传统国学教育，稍年长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科学。他思想西化，鄙视科举，大约在1896—97年著《仁学》，然后投身维新运动。慈禧发动反对光绪的政变前夕，谭嗣同联络袁世凯，希

望杀荣禄、囚慈禧，不幸遭袁世凯告密。谭嗣同本有逃跑机会，却主动选择赴死，留在名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自由派知识分子

六四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推上历史舞台，包括 1980 年代后期在大学生群体中最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科大副校长方厉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从 1978 年起就长期呼吁民主的魏京生等。这些人忧国忧民，被良心驱使，甘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呼吁自由民主，值得人们尊重。以下重点评论方厉之与刘晓波，因为他们最出名，留下的言论与文字也最多。

方厉之

方厉之曾任中国科大第一副校长、学部委员，在 1986 年学潮中出名，在 1989 年学运中受学生群体拥戴。六四后他流亡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授，并挂名海外民运组织的头儿，但不再活跃，基本算销声匿迹，于 2012 年去世。

方厉之在少年时代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他的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 20 岁出头，他被打成右派，然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挨整，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开始羡慕西方制度与做法。成为科大副校长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公开讲自己“恨透了(中共执政后的)三十年这种东西，…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他主张“全盘西化”，并鼓励学生闹事。他说过，“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方厉之思想缺陷明显。他从亲身经历中发现共产主义行不通，于是向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就是西方自由民主阵营。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言论或文字表明他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根基是什么，或马克思主义到底错在哪儿。大学生们听了他的鼓动，只知道他要打倒当前制度，却不知道他要如何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这个局限造成他离开中国后不再有值得称道的作为。因为他在国内时的影响力，其基础是他的社会地位，不是他的思想。如果他没有科大校长和学部委员的光环，单听他的话，没多少人会被说服或感动。但他的社会地位来自中共，他利用中共给他的资源反对中共。离开中国后他失去了这些资源，也就失去了社会号召力，再无法影响中国自由民主运动。

刘晓波

六四时，刘晓波还是个年轻教师，在国内学术小圈子里活跃，但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他在六四前就主张中国要全盘西化、要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等。当时有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私下非常向往西方，但不敢公开说。他敢，于是出名。他出名是因为他极端，不是因为他正确或深刻。他在 1988-89 年短暂出国访问，在与西方实际接触中，他又开始怀疑西方文明，

曾写道，“西方文明无法拯救人类”。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要全盘西化、接受西方三百年殖民呢？他的自相矛盾源于他严重不理解西方，所以不知如何理性、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这样粗糙、肤浅的思维，在现实中必然行不通。

刘晓波在 2008 年参与发起《零八宪章》，因此在 2009 年被判刑 11 年，并在 2010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无法出席颁奖仪式，由别人代读他最著名的文章《我没有敌人》。2017 年他病逝于服刑期间。《零八宪章》试图复制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1977 年，捷国还在共产党统治下，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提出《七七宪章》，在捷国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促成“七七宪章运动”，为 1989 年捷国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党统治，起到前期铺垫作用。很多《七七宪章》签署人成为 89 革命中坚，包括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哈维尔。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希望中国也像捷国那样摆脱共产党统治，却没看懂两国之间的根本差别。捷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主要信仰天主教。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捷国施行严刑峻法，关闭大量教会，关押神职人员，一般教徒也常遭迫害、职场升迁严重受阻。即使如此，捷国人民依然心向传统信仰。比如在 1960 年代末，共产党执政大约 20 年后，该国斯洛伐克部分做过普查，发现认同无神论的人只有 14%；九成农民、四分之三的蓝领、一半白领，依然自称基督徒。如此信仰坚定的人民，不可能真心服从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捷共能掌权，只因为其背后的苏联太强大，人民还没找到机会推翻它而已。

中国社会没有类似信仰基础。政治上，主流国人信奉“打天下者坐天下”，现代说法叫“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的暴力最强大，老百姓就觉得谁最有执政合法性，没多少人要求掌权者必须支持自由民主。在中共打赢内战后，无论其政策如何专制，大多数人都接受它统治。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枪杆子做后盾的任何宪法都是笑话，不但执政者觉得是笑话，一般老百姓也觉得是笑话。《零八宪章》在中国人中几乎没人在意。刘晓波的真诚与勇气可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但他倾注了心血、最后为之失去自由和生命的《零八宪章》，却反映他自身与整个自由派群体的天真、或无能。他们要么在作秀，要么没看懂中国现实，要么兼而有之。

学生领袖

六四期间、及其后数年，“学生领袖”群体格外引人注目。有全国级的，比如被通缉的王丹、乌尔凯西、柴玲等人。在各大学里也有，比如我全程参与的交大。但更贴切地讲，这些“学生领袖”是学运中的信息联络与后勤人员，不能算领袖，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起到领袖作用。比如没人因为听到某个学生领袖的政见而出游行。在运动高潮时期，自由派出于策略考虑，希望降低学运热度，曾想让学生领袖们暂时阻止、或更好地协调学生游行，但完全没做到，因为这些学生领袖根本无力左右学生们的活动。并非学生们不想有真领袖带领自己，而是学生领袖们没那个能力。

学生领袖们并非通过货真价实的民主选举产生。比如在交大，我们曾试图搞选举，但没有条件让候选人们充分辩论或竞选，也做不到大规模、有秩序地组织同学们投票。所有选举都是小范围的、都混乱。有时刚选举完不久，当选人就因为官方、或家庭压力选择淡出，我们只好再举行选举。这让选举变得缺乏可信度，匆忙中造成敷衍。所以最后推出的学生领袖们无法真正反映民意。据我所知，学生自治组织在这点上都类似，包括交大的、其他学校的、和全国性的。

高层操纵学运，造成学生领袖经常是傀儡。我们当时就知道，那些在中央电视台有出镜机会的学生领袖们，背后有通往中央高层的信息通道。其实是高层选择了他们，利用他们向外放话，操纵运动、操纵学生。他们因此换来出名，成为名义上的学生领袖。比如在后来几十年里，王丹回忆当时情况，以自己联络广泛、层次高为傲，其实就是被操纵。这样的学生领袖不是民主产生的，并不真了解、或真在乎广大同学，与普通学生有严重隔膜。普通学生也不在乎他们。

回首往事，运动中的普通学生有理由对学生领袖们感到失望。成千上万的普通学生为悼念胡耀邦、反腐败、自由民主等原因，不顾个人风险，上街示威游行，才有了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的六四运动。学生领袖们因此出名了，与高层和外国媒体扯上关系。如果运动成功，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出将入相，名利双收。但在运动进入危险期后，他们中很多人却利用运动中获得的资源，逃跑得比谁都快，留下普通学生面对六四屠杀和事后的政治迫害。在道义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学生领袖愧对普通学生。

以下简略点评王丹和柴玲。无论好坏，六四后这两位还有些相关活动和言行，反映学生领袖群体的一些普遍性特征。其他人要么完全淡出自由民主运动，要么在小圈子里互相争论，但基本上离开了大众视野，总之都不再重要，也让人无从评论。

王丹

总体看过去 35 年，王丹大概算当年学生领袖中表现最好的。但在六四失败之初，很多人对他不满。有消息说，在屠杀发生之后的几年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曾希望提名六四学生领袖。他们考虑了柴玲，但没考虑王丹。诺贝尔奖从不公布为什么提名或不提名谁，但有人猜测王丹没上榜，因为他入狱后与官方合作过分密切、关系过分融洽，让外人觉得他投降了。当然，最后柴玲也落选。

六四后近 10 年，在美国压力下，中国于 1998 年释放王丹。他旋即来到美国，之后二十多年里身居海外，一直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六四失败后，原来的学生领袖们大多追求个人发展，远离政治。有些人继续打着自由民主旗号，但实际上追求个人利益。更有甚者选择投靠中共阵营，调转枪口，反对自由民主，比如孔庆东。相比之下，王丹值得尊重。但他对中国的分析与论述，以回忆自己从前与高层和名人的交往、以及透露中共高层最新小道消息为主，被人戏称为“中南海听床师”。关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为什么总失败、未

来如何走出困局等关键问题上，他没提出自己想法。缺乏独到有价值的见解，是他的重大局限。希望他在思想上能更上一层楼。

有人指证王丹在被关押期间写出 13 万字交代材料，对近五百人做了详细的有罪陈述。王丹选择不直接回应，更让外人觉得指证可信。我在六四后也被逼写过交代材料，内容也涉及他人，这在当时不可避免。当然我远不如王丹重要，认识的人没他多，受到的压力也很可能没他那么大。但这段经历给予我相关体会。当时自由派和体制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要么中共为六四平反，要么中共灭亡。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参加六四都将变成光荣的事。在东欧剧变之后，这种看法尤其盛行。在那样的大气氛下，王丹写出其他人在运动中所作所为，被讲到的人可能会感谢他，尤其是那些已经逃到海外的。他们会觉得自己由王丹写出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未来可以作为强有力证据，证明自己为中国自由民主做过贡献。

不过，还有很多学生领袖留在国内，王丹的供词可能威胁他们，他的批评者们也有一些道理。总体讲，六四运动太引人注目，参与人太多，组织太松散。即使王丹不说，别人也会说。官方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比如运动中无所不在的监控、线人等，最后结果很可能一样。再讲，中国官方的刑讯逼供，可选择手段非常多，一般人没经过特别训练，没能力抵抗。王丹只是个年轻学生，外人不应该过高要求他。

柴玲

柴玲在六四期间很活跃，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后逃到美国，经商至今。她早淡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却偶尔发表有关六四的言论，让人侧目。2012年6月4日，她发表中英文公开信《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讲到“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总之，她以耶稣之名，原谅六四施暴者。

作为基督徒，我认为这封公开信内容荒谬，违反基本道义，错误理解《圣经》。她在信中引述《圣经》里两个著名故事，作为原谅六四施暴者的根据。一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在万分痛苦中说，“父啊，赦免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帝国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二是古代以色列君王大卫的事迹。他亲儿子押沙龙背叛他，试图武力夺权，他却选择原谅儿子，平叛后不愿杀儿子。柴玲忽视了这两个故事里共同的关键点，原谅人的都是直接受害者。在六四流血中，柴玲不是直接受害者，那些死去的人才是。只有他们、他们最亲近的亲人、或他们特别委托的人，才有资格选择原谅施暴者。柴玲没有资格，无权越俎代庖。耶稣劝我们多原谅人，但他从没代替我们原谅加害我们的人。

柴玲本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有责任尽可能保护同学安全。但有证据表明，1989年5月底局势紧张时，她选择丢下同学独自逃跑。后来发现没事，在六四前她又回到广场，但不再起领导作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为中国人去

奋斗不值得”、“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中共)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中共)不采取下策，(我们)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很多人认为这段话反映柴玲本心，就是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等未来民运成功后，自己再回来摘桃子。所以关于六四流血，柴玲应该思考如何祈求死者们原谅她，而不是代替他们原谅施暴者。

中国文化里有假借宗教之名，实际谋求现实利益的传统。《水浒传》里鲁智深杀了镇关西，为逃避官府通缉，而不是为信仰佛教，出家当和尚，就是人人皆知的故事。在六四屠夫们毫无悔意的情况下，柴玲高调发表原谅声明，被认为是她为方便回国做生意、向中国政府伸出的橄榄枝。中国经济起飞后，很多海外华人想搭顺风车。多位流亡到西方的六四学生领袖为赚钱已回国。早在 2004 年就有报道，柴玲试图回国做生意，但没能成行。其实大多数六四学生领袖早已放弃自由民主理想，专注赚钱和过小日子。这属个人选择，本无可非议。如果柴玲想这么做，也算正常。但她偏要打着耶稣旗号，明明不具备高道德标准，却要争抢道德制高点，让其他基督徒无法沉默。《圣经》教导我们原谅别人，意思是“不要以恶报恶”（彼得前书 3:9，罗马书 12:17），但要“以善胜恶”（罗马书 12:21）。越俎代庖、原谅毫无悔意的杀人凶手，是恶，不是善。

小结：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是六四参与者，与运动领导们无冤无仇，却曾有共同梦想，都希望中国早日实现自由民主，为什么我对他们持总体批评态度呢？道理很简单，六四失败的太惨烈，六四之后的 35 年里，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退步得太严重。军队打胜仗时，将军们功成名就，所以军队打败仗时，将军们就要负责。公司赚钱时，管理层得利多，公司亏损，管理层就应该负责。同理，如果六四成功，领导集团将飞黄腾达，现在六四失败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退步了，领导集团就要负责。这是公平。

任何政治运动的失败，背后原因必然很多。但追溯溯源，我认为六四和其他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一样，失败的根源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在六四运动中，无论领导集团还是普通大学生们，其主流世界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他们都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人是高级动物——比如把人看成老黄牛、甚至螺丝钉，是个物件、连动物都不如——还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决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等。大多数国人持有这些观念，却从没严肃推敲过。即使在中国顶级知识分子们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世界观与自由民主不兼容。比如最简单的一点，哪种群居动物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如何让一堆螺丝钉施行自由民主？

看六四运动领导层，所有赵紫阳集团成员，以及稍年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如方厉之、鲍彤、钦本立等，都是中共党员。如果不是，他们没机会爬到足够高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影响力。他们都经历几十年不间断的党内洗脑，并成功度过了那个强烈敌视西

方的年代，头脑里只剩下中共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其他系统化思想，尤其不可能有基督教信仰或西方主流哲学思想。如果有，他们早就被打倒、出局了。即使有些人后来仇恨共产党，声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框架经常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不理解、不熟悉任何其他思想体系。

思想禁锢于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六四参与者们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共治下持不同政见者们的通病，几乎没有例外。著名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魏京生等人，都看到了中共制度的荒谬和残忍，都勇敢地挺身而出，呼唤自由民主。但他们批判中共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志新自认是最真的共产党员，喊出“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她认为毛还不够左。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以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指责官方政策重视人的出身，是修正主义。林昭曾是狂热的中共党员，为革命誓与家庭“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并在土改中残忍迫害他人。为对党表忠心，她无中生有地诬陷和揭发自己的父亲。她在监狱里写过长篇自述，讲到自己的思想基础，完全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那套，比如“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18】。顾准是个中共理论家，试图探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如何实现自由民主。他旁征博引，却都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打转，所以一直找不到出路。魏京生要求把民主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认为民主“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17】。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有迹象表明，林昭和顾准在生命最后阶段接受了基督教。即使这是真，在接受基督教之后，他们并没有留下有分量的反思，对社会没什么影响。



图 9. 已故去的中国政治异议者。顾准(1915—1974)，林昭(1932—1968)，遇罗克(1942—1970)，张志新(1930—1975)。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与现代自由民主很遥远。他们与当时亿万普通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远比普通人更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真诚让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不起人真诚追求。如果你真诚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主义是假，你也就成了它的敌人。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勇敢可敬，但也可惜可怜。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找到个人自由和国家民主的道路，本质是缘木求鱼。世界各国百年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并不傻。接受了唯物论、人是动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雇佣者剥削被雇佣者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对立。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普遍理论修养不足。比如魏京生认为民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并没有可信理由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了，国家就一定要民主。虽然他言辞灼灼，但逻辑缺缺。这些人理论眼光都不够犀利，看不懂基本逻辑。比如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既然人的意识被外界决定，思想自由就不存在。没有思想自由，其他自由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让他们走上歧途，即使做出巨大牺牲，包括丢掉性命，也没能为民族找到自由民主之路。

1980年代的青年，包括年轻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大学生们如王丹等，在学校和社会里接受全套中共思想灌输。同期的改革开放又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东西方鲜明对比，知道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所以他们厌倦政治课、反感被洗脑。但总体讲，他们的应对方式不是奋力寻找真理，而是消极对抗、停止思考，选择享乐与堕落来逃避。比如在六四运动期间，乌尔凯西接受外媒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代人只想买到耐克鞋，能听摇滚乐，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全凭我记忆，只是大意）。在我身边的同学里，少数人努力争取入党，但绝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只觉得入党有利于以后向上爬。大多数人梦想多赚钱、生活好等。应对功课之外，他们打牌喝酒读闲书，没什么人严肃探求信仰、主义等大问题。

享乐与堕落不可能帮助人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的桎梏。由于缺乏严肃的思想探索，我们这代大学生的主流世界观没有进步。绝大多数人习惯性地、下意识地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动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即使他们厌恶“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字。其实每个人都有世界观和人生观，即使他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什么。

有些同学研读西方哲学。当年在校园里，读尼采、弗洛伊德的书比较流行。但无论在校时、还是后来几十年里，我与交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们接触，还没遇到谁真的读懂读通，更谈不上把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恰当地用在生活中。当年有些人去教堂，觉得很新潮和好玩，但几乎无人认真研读和理解《圣经》，更别说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一些来到西方国家的六四参与者后来成为基督徒，比如柴玲，但总体比例不高，且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常不深、也不对，比如前文讲到柴玲对《圣经》理解有严重偏差。总之，至今还没看到谁跳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面反思六四运动和中国自由民主事业。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六四运动，中国自由派有十年时间与世界交流，本有机会学习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但他们没做到。从六四到如今又是35

年，很多自由派人士来到西方长期生活，但他们依然与前辈一样，没理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没能跳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自由派集体性思想肤浅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几乎无人能提出系统化思想，指导中国如何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即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观点也经常不合逻辑，在现实中不可行，不被老百姓接受。我以刘晓波最著名的文章《我没有敌人》为例，谈谈自由派思想匮乏到什么程度。

2009年12月，刘晓波在中国接受审讯时向官方递交《我没有敌人》，作为交代材料的一部分。2010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这篇文章闻名天下。文章名字就是他的中心思想：我刘晓波与所有人都友好，不把任何人当作敌人。读过的人都懂，他在说给中共听。潜台词是我对你都如此和气了，你也向我学吧。否则全世界都将笑话你不够大度，你多没面子呀？所以你不要再把我当敌人，也别把自由派当敌人，与我们做朋友吧，允许我们搞自由民主，然后让我们推翻你的独裁专制统治。



图 10. 人无完人，刘晓波真诚勇敢，值得被尊重，但他思想有严重缺陷。左，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现场，刘晓波不能出席，由一把空椅子代替。右，2020 年香港青年纪念刘晓波逝世三周年。他已成为中国自由派的精神代表。

就是因为敢于要求民主、要求剥夺中共对政权的垄断，刘晓波才出名，才登上政治舞台。如果他没有敌人，那么中共又是他什么呢？朋友？不可能。不相关的路人？也明显不是。权力竞争对手？在当前的中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权是中共的命根子。如果失去政权，大量中共成员的利益将严重受损，罪行也将暴露，很可能身败名裂，直至性命不保。所以中共不可能自愿交出权力，任何权力竞争对手都是中共的敌人。任何人，包括刘晓波，对此顾左右而言他、换个名词等，都没用。这就是现实。

为表现出自己真没有敌人，真没有仇恨，刘晓波在文章中特别讲到，起诉和判决他的检察官和法官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尊重他们的“职业与人格”。但同时他又强调，自己的言行从来符合中国宪法，起诉和判决他违反了中国宪法。如果这样的话，检察官和法官就是知法犯法，刘晓波为什么还要尊重知法犯法的检察官与法官呢？为什么他们的“职业与人格”还值得被尊重？错误思想必然造成自相矛盾，在现实中造成荒谬。

刘晓波有多个可能原因让自己显示内心纯正、与世无争、像个圣人。第一，他身陷囹圄，希望获得轻判。第二，在自由派内部，六四学生领袖群体在当时已变得不重要，刘晓波名声渐涨，成为精神领袖类人物。他可能希望利用这篇文章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名声和地位。第三，自 1989 年起，不断有传言，诺贝尔委员会希望把和平奖授予六四参与者，刘晓波是经常被提及的候选人。但无论什么原因，在没有内在精神与思想做基础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自我拔高显得空虚无意义。耶稣可以说自己不是罗马帝国的敌人，因为他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凯撒是罗马皇帝，耶稣属于神，不想夺凯撒的权。耶稣不从事政治活动，不搞起义。罗马人依然不相信，杀了他。但即使被杀，耶稣也不反抗，甘愿接受。他是真不想夺权，因为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里。刘晓波参加六四、起草《零八宪法》等，都是政治活动，都为夺中共的权，怎么可能不是中共的敌人？“我没有敌人”这句口号只可能打动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外国人，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相信或被感动。无论支持中共的、还是支持自由民主的国人，都会觉得它太假了。

第三章 国人本性相通

六四运动后半段，我开始陷入冥想，历时大半年，在心里遇到神，不断与神对话，后来去教堂礼拜，从此有了信仰，支撑我度过六四后大规模清算。当时信教还近似禁忌。文革后人人对此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家人担心我因此受迫害，未来找工作和升迁遇到障碍。教堂里的老牧师时而谈起 1949 年后教会、信徒们、和自己经历的种种可怕遭遇。教友们也会说起教堂外常看到便衣警察监视等。所以我信神后，缺乏自由问题变得真切而尖锐，原来抽象的自由民主一下子显得实在和直白。我崇拜神、研习《圣经》，就需要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与牧师和教友们讨论，就需要言论自由；去教堂做礼拜，就需要集会自由；教堂和教友们需要《圣经》，就需要出版自由，等等。我觉得美国那样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好，因为它允许我追求神，保护我需要的这些自由。

朋友们都知道我皈依基督教。我曾很多次小心翼翼地试图与他们讨论耶稣，但都被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岔开。我了解他们。那时的人普遍认为宗教是迷信，只有教育程度低、头脑简单的人才信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屑一顾。同学中传说，我在六四中受挫、断送了大好前途、心灰意冷，所以才需要麻痹心灵，在宗教里找寄托。如果我硬对他们讲，他们只会觉得我走火入魔，被教会操纵，急于拉人入伙，他们会更加排斥。当年中国社会里没什么宗教气氛。除我之外，没听说哪个交大学生信教。我的心灵经历深刻而丰富，是多维的，超越时空，但几乎都是非语言形式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难找到恰当词汇描述，因为常用中文中根本没有相关表达。所以我长期无法与人深入交流，直到今天也只能与人讨论其中一小部分。

六四之后，几位好友坚持自由民主理想。我们经常聚会，互相交流鼓励，抱团取暖。我们都认为六四运动没错，都憎恶残暴的政府，冷眼看六四流血后还想钻进体制、或在体制内

向上爬的人。有时我们坐在一起笑话那些争取入党的人，或特别专营、想当官的人，觉得他们功利心太重，湮灭了良心。记得一位朋友讲到，他父母有位熟人，1949年前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文革时遭到严重迫害，文革后被平反。在耄耋之年，他多次被邀请入党，因为党希望把他树成典型，以安抚老一辈上海资本家，并招揽海外投资。但他总婉拒。熟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保持晚节”。朋友讲到这时，在场所有人咋舌。我们都佩服这位老上海人。

那时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纯洁、珍贵，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暖。六四过后，老百姓普遍厌恶政府，同时也鄙视民运领袖们。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比如交大老师们、我父母的朋友圈等，都把民运领袖看成政治投机分子，类似文革时各路造反派头头。大学生们年轻，不像长辈们那样看破世道，但也对他们失望，觉得他们在关键时刻逃跑，只顾自己，辜负了众人。我当时觉得身边那几个朋友最纯粹，对自由民主最忠诚，远比任何六四领袖或名人强。这些朋友都是很好的人，中正诚恳，非常聪明。在压抑的大环境里，他们在我心里点亮一盏希望之灯。我总想，我周围就有好几位坚信自由民主的人，全国应该有很多。我们听不到他们的消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压制，无法把想法传递给外界。至于更多同学忙于生计、对自由民主失去兴趣，我觉得正常。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们十几年寒窗，名牌大学毕业，想做官向上爬，视野因此变窄，看不到即将到来的自由民主潮流。从全国范围看，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广大人民应该看得清形势。

当时一大批同学私下觉得，如果再来一次民运，由于自由派有了六四经验，策略会有大幅改进，很可能就会成功。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共处理六四如此残暴无理，外媒又全方位报道过，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看个清楚，政局不可能长期稳定，下一波民运必将到来。到时候共产党要么下台，要么顺应民意。无论哪种情况，中国的自由民主化都指日可待。六四后不久，东欧和苏联剧变，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这种观念在民间变得更加流行。当然现在回头看，自由派，包括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当时太乐观了，没看清中国真实的民情民意。

经过认真思考，朋友们改变想法

1990年代初，中国还很穷，但经济起飞，个人发展机会变多。我靠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留学，朋友们则留在国内发展。当时我们都懂，经济发展不代表政治自由。即使经济变好，国内专制状况依旧。不知哪天政局波动，人们刚开始享受的那点经济自由，外加个人财富，都可能得而复失。

2000年代初，一位朋友来美国出差，我们聚会长谈。他说到中国未来很不确定，我在美国消息更灵通，如果有大事发生，我一定要赶紧通知国内朋友，帮大家早做准备。他特别讲到，如果国内重回左的那套，他就移民北美。他在外资企业里工作，与西方人接触多，

移民是个很现实的选择。当时国内同学普遍比较成功，是外资或国有企事业单位里的骨干，业务能力、经济实力、和社会门路都大增，已经有能力移民。

大约又过了十年，习近平主政初期，我看到国内高层政治斗争白热化，已回到毛泽东时代你死我活的程度，于是认为中国政治必将巨变，老百姓的自由与财富都将被威胁。我急乎乎地与国内朋友们联系，并趁回国机会与他们多次见面，劝他们早做准备，尤其要考虑移民。我还对他们讲，移民要趁早，因为这条路将越来越拥挤，最后可能难到不现实。他们当时四十几岁，年富力强，有技术有经验，也有足够的财富积累，移民北美后比较容易找工作，即使一时不工作，也能轻松活下来。

我遇到第一个意外。那位 2000 年代初曾与我约定，如果我看到国内突变迹象，一定要告诉他，好让他有机会移民的朋友，这时很诚恳地告诉我，他知道中国政治正在迅速左转，已观察思考很久，并做了最后决定，他将留在国内，不会移民。我特地问他，如果中国重回文革，再搞个人崇拜，钳制思想与言论，你也不想移民吗？他认真地说，“对”。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的惊讶。我本以为任何人支持自由民主，都因为自己需要自由。现在他有必要、也有机会奔赴自由，为什么放弃？他与我分享他的考虑，关键因素包括他的职业发展、孩子和父母、去北美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他没明说、但我俩都懂的还有，他的公司、房产等都在国内大城市，是他财富里的最大头，他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他诚恳地要求我理解他的处境和决定。在那个瞬间，我头脑里闪过《动物世界》里非洲猎人抓猴子的场景。

我的第二个意外，那位在六四后曾讲故事鼓励大家，说到老上海人为保持晚节、拒绝入党的朋友，此时已经入党。原因直截了当。在国营单位里不入党，工作起来不方便，无法从事某些岗位，影响升迁。对于中年男性来说，个人成就感最重要，其他考虑只得让路。曾经一同经历六四、支持自由民主的朋友之间讲到入党，难免有点尴尬。他解释道，自己只是一般人，只想过一般人的生活。入党只为方便工作而已，与自己的政治主张没关系。说到底，小人物无论入党或不入党、支持或不支持自由民主，对国家大局都没什么影响。何必只因为向往自由民主就拒绝入党，让自己工作不便、事业受损呢？

这两位朋友的变化远非特例。回想六四屠杀之后三五天，上海举行最后一次学生游行，气氛悲壮肃杀。队伍回到校园里，所有人散伙回宿舍。但还有一位同学站在卡车车斗上，孤零零在校园里转一圈，通过电喇叭高喊运动口号，在当时被看作勇敢的象征。另一位同学因六四失败，心情郁闷，夜里在街头喝酒，然后找警察打架，连警察都不敢惹。当时很多同学们私下里竖大拇指。但这两位毕业后进入公家单位。二十几年后，习近平取消任期制，大权独揽。我回国联系到他们，他们竟然都明确支持习，全不在乎习的独裁远超过 1989 年时的任何人。说到谁批评习或中共，他们还很不高兴，骂人家不爱国。

六四中交大那批学生领袖们后来都选择低调，再不谈自由民主。其中很多人私下里表示后悔，觉得年轻时太糊涂，参加了反政府运动，让自己头上有了标签，在后来国内经济起飞时期失去很多机会。一般同学忙于生计和发财，躲避六四问题，甚至觉得现在还谈论或思考六四运动都是犯傻。流行的情绪是，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为老百姓生活好。当年大家支持六四就出于这个目的。中共镇压六四后，经济起飞了，那么镇压大概就是正确的。但他们自己参加了，现在说镇压对，明显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总之，六四一代大学生的自由民主抱负早就塌方，当年的理想已灰飞烟灭。说起来让人心痛。

重新理解朋友们

六四中结成的友谊，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朋友们对我的重要，我曾觉得与他们心心相通，突然发现的变化让我觉得需要再努力，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一晃又十年过去了，相关思考让我写出多篇文章，包括《文革重来？》、《中美对抗与文革2.0》、《缅怀一位交大前辈》、《眼下与未来的中国政治主线》、《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乱世、治世、与现代民主》、《自由的人性观基础》等【5】【9】【11】【12】【13】【14】【16】。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想得越深，就越觉得问题的本质很简单。

我们年轻时，人人一无所有。第一位朋友热烈支持自由民主，因为如果中国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变成自由民主，意味着社会大洗牌，名牌大学毕业的青年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他其实并不强烈需要、或向往自由民主的具体内容，比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他当时崇拜欧美，羡慕移民的同学，因为欧美经济远比中国发达，移民意味着物质生活将更好。他其实不在乎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中年后他事业有成，名下有公司和房产，再加上父母变老，孩子长大，做决策时必须顾及所有这些事项。经过全面认真地思考，他非常理性地发现，自己事业已经定型、现有生活舒适，移民后必须从零开始，得不偿失，所以他不再想移民。另外，国家自由民主也变得好坏参半。一方面，社会大变动可能损伤他既有财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英雄梦，他年轻时参与六四，如果自由民主成功，他将成为时代先锋，想想也骄傲。所以他在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想法很正常，但没用。因为中国统治者非常了解这种心态，早准备好各种手段保证如果他要安全、他就做不了任何真有效果的事。后文将谈到，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术就是为这样心态的老百姓设计的。

他的转变很像那些在1949年前支持自由民主的大学生们。前文讲到，交大老师中有很多这类人。在《缅怀一位交大前辈》中，我介绍过自己从小熟悉的一位【11】。这些前辈们年轻时也都一无所有，充满理想主义，真心支持自由民主。但1949年后，中共剥夺了人民仅剩的一点自由民主，他们却选择就范。他们与我们都是交大人，聪明程度类似。经过严肃理性的思考之后，他们也发现对于个人幸福而言，西方人崇尚的各项政治自由没那么重要，国家自由民主远比不上自己职业发展、家人安全、孩子前途等来得重要。

纵观我熟悉的两代交大人，相隔近半个世纪，年轻时都热烈支持自由民主，但在后半生里都以各自的方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真在乎自由民主。比如我朋友有机会逃离独裁专制制度、奔往自由民主社会，却明确拒绝；我老师和长辈们面对史无前例的独裁专制，却真心拥护等。他们当初支持自由民主肯定另有原因。稍加观察和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们实际希望的是社会大洗牌，然后自己能在洗牌中超常规晋身，甚至一步登天。比如进入政界、就是当官儿。或即使自己不当官、但运动中的同道当官，自己也可以利用与他们的关系升迁、发财等。这种心态具有普遍性。在历代支持自由民主的国人中，绝大多数都如此。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民主只是最可能促发社会大洗牌的动听口号而已。

我的第二个朋友本质上也一样。我们读大学时，自由派学生们想法相通，觉得中国必将自由民主，谁还花力气争取入党就是犯傻，不如做个逍遥派。六四后，坚持自由民主立场的人数大减，剩下的人更自觉是精英，引领社会；而且下一次民运不久后就来了，改革派将上台，自由民主将变成主流，到时候自己就是元老；即使那些自我标榜的逍遥派，也可以在事业上弯道超车，超过眼前得势的党员干部们；在这种时候入党，如同光绪年间自我阉割进宫当太监。

那时他佩服拒绝入党、只为保持晚节的旧上海滩弄潮儿，当作自勉时的榜样。但进入中年后他发现，中共正统派统治越来越牢固，完全没有下台的迹象，而自己事业进入了关键期，再不入党，造成的损失将变得不可弥补。于是他觉得多我一份坚持，中国自由民主也不会成功；少我一份坚持，自由民主也不会失败。自己位卑言轻，只需考虑个人得失就好。

我曾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中讲过刘少奇之子刘源政治立场变化过程【13】，本质与我朋友的一样。刘源年轻时也一无所有，热烈支持自由民主。但进入社会后马上发现，如果不投靠专制体制，自己就是个平头百姓；如果与专制体制合作，自己可以跻身国家领导人序列。他与我朋友都面对理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经过认真思考，他们都选择追求个人事业，把年轻时的理想放在一边。

刘源大概与我朋友一样，觉得自己无法左右大局，所以不需想那么多，还是以个人成就为重，先爬上去再说。有人会说，刘源比我朋友官位高多了，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朋友像刘源那样位高权重，可能就会以民族大业为重，坚持理想，放弃个人利益了。其实不然。从刘源角度看，自己只是解放军四总部中一个总部的双首长之一，还有其他7位与自己一个级别，上面还有一大堆现役和退休的军委成员，再上面又有一大堆在任和退居二线的国家级领导人。自己与他们相比只是个小人物。要说影响大局，就连刘少奇、李克强都做不到。14亿人里13亿9999万9999个都可以说自己人轻言微。甚至连毛泽东、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抱怨自己能做的不多。官位确实有大小之分，但都是相对的。我们同学大多是处级干部，与县长同级。在普通农民看来，处长就是高官，类似我们同学看刘源。刘源为利益放弃理想，同学们可能会觉得，“你都那么大官

了，该满足了，怎么还这样？”同理，我们同学们为成就感放弃理想，普通农民也会有类似疑问。

我曾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中介绍过 400 年前英国清教徒迁徙到北美、争取自由的历史。他们喊“我要自由”，是真的要自由。他们需要按自己想法崇拜神的自由，但英国制度不允许，于是他们自我放逐，远渡重洋，经历超高比例的疾病与死亡，来到荒无人烟的马赛诸塞湾，建立自由民主的殖民地。相对比，中国近现代多次政治运动，尤其历次学生运动，包括 1919 年的五四、1940 年代的学生运动、1976 年的四五、1986 年的学潮、和 1989 年的六四等，也高喊“我要自由”，却都是假的，都在撒谎。因为运动的主流参与者们渴望的是权力与利益、并不是自由。他们几乎从没严肃思考过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更没准备好为自由牺牲一切。他们喊自由的真正含义是，“我想把当权派搞下来，我取而代之，而‘自由’是我能找到的最好借口”。这种想法的本质与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一样，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你们做王侯将相？我们要打倒你们，换成我们自己做。比如在各次学生运动中，参与者与他们反对的当权派经常出自同一批名牌大学，世界观与人生观本质都一样，只是在现实中各为各自的阵营而战。双方的最高人生目的，说白了，都是获得尽可能高的权位，赚尽可能多的钱，生活最舒适等。

国人的人生观高度趋同

我逐渐理解朋友们。他们人生最高目标，也是做事的最大原则，就是在可行范围内把自己人生过得最好。为此，他们放弃了年轻时不成熟的自由民主理想，转而追求个人幸福感，包括事业成就感、保护和支持家人等。总之要快乐尽量多、痛苦尽量少。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谁不这样呢？

看懂朋友们，也加深了我对中国人的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国人，在人生观层次上都相像。交大老地下党们和我父母的那位同事，都是 1949 年前交大学生，生长在民国，与我第一位朋友的思路很像。我的第二位朋友与刘源，一个六四学生、另一个六四时期中共高级官员，一个平民、另一个太子党，一个成长于改革开放的 1980 时代、另一个成长于文革，根本想法也一样。再扩展视野，六四积极分子们与党员同学，当年看似泾渭分明，几十年后都变得成熟，同样为升迁、赚钱而努力，各方面想法趋同，包括政治观念。类似地，当时学生自治会的头头们与官方学生干部群体，海外民运人士与国内共产党干部们，赵紫阳与邓小平、毛泽东与蒋介石、孙中山与袁世凯，甚至刘邦与项羽、唐太宗与李元霸、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等。每对对手之间乍一看针锋相对、势如水火、不共戴天，内在本性却一样。他们都追求在可行范围内把自己人生过得最好，事业最成功，幸福感最高，快乐最多、痛苦最少。主流国人都如此，而且自古如此，中共远非始作俑者。

初中时大家读《三国》、《水浒传》等，十几岁的孩子们就懂，要成大事、做大人物，就要心狠，为利益不择手段，比如诸葛亮与周瑜、或晁盖与宋江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一文中，我称这些王侯将相为功利主义者。但看朋友们的转变，再联想到身边各色人等，我发现几乎所有人，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在做重大决定时都类似，都追求现实好处最大化，抛弃任何“虚的东西”，比如誓言、理想、道德、主义等。只有当违背它们的成本太高、高过可能获利时，人们才遵守它们。所谓“唯利是图”，其中包括在必要时做到“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国人普遍的人生观，超越政治阵营，超越时代。

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不可能、不應該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郑重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

--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你要想认识中国，去认识那个村庄就够了；你认识了那个村庄，也就真正懂得中国了。

1978年，我20周岁参军离开这个村落后，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的大伯在我每年探亲回家时，都会与我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地问：“连科，你说我们能真的解放台湾吗？中国和美国打仗能打过美国吗？”我大伯是2006年谢世的，这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他一连问了我28年。之后在那个村庄里，我以为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了，然在二年前，我又回到那个村庄时，有个给我叫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

我为我邻居的思考惊慌并愕然。

--节选 阎连科获奖感言《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

一张令人尴尬的历史照片

冯克力先生所著《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中，有篇文章刊有一张照片，足以令目下的当政者感到尴尬，特录于下。



那时：政权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抵制根据地的一次集会，主席台一侧的标语“迅速结束一党专政”，赫然在目。

图 11. 最有权势的人、最没权势的人、最体现民族政治文化的党【4】，本性都是相通的。当手里有了主动权，他们为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会抛开所有主义、道德、法律、保证、信誉、廉耻、合约等。他们心里没有高过利益的顾忌，所以导致无恶不可做。

中国人信仰宗教，经常也为求现实利益，不是真信仰。比如和尚、道士等，把入教当作谋生手段。普通信众拜佛求仙，就是为升官发财。在美国我听说过很多大陆来的基督徒为利益受洗。比如有人觉得平时与本地人接触机会太少，生活不方便，所以去教堂。我有一位熟人说他决定入教，因为旅行时可以借住在同门教友家里，省下旅馆钱。还有一位更离谱，在国内申请美国理工科博士，拿不到奖学金，后来听说申请神学院容易拿奖学金和申请签证，于是匆匆在国内受洗成为基督徒，递交给神学院的申请书中信誓旦旦要把一生献给神，但到了美国就从神学院退学，转到容易找工作的理工科专业。他讲这段故事时笑嘻嘻，全然不觉得自己卑鄙。

胡适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提到过，1926年，他在火车上遇到英国女作家谢福芸，二者深入探讨中国人信仰问题，期间胡适讲了这句话。谢福芸出生在中国，是在华传教士的女儿，笃信基督教。她认为中国有真基督徒，理解神、坚信神，为神甘愿赴死。胡适不同意，认为中国人都唯物，包括中国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是个无神论者，不信任任何宗教，认为都是精神鸦片，专骗老百姓。这套唯物思想限制了他的视野，造成他思想狭隘，无法理解几千年来基督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们，包括中国基督徒里的英烈们。他欣赏马克思唯物主义，但受不了现实中遇到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们。他的思想深度不够，看不懂那些他不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他喜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产物。他嘴里的“唯物”是个直觉概念，指国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计其他，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很相近，但意思更泛泛，涵盖面更广。

驭民术

当代中国人中流行的那些“主义”，如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等，都是最近一个多世纪里的舶来品。中国先哲们当然不知道它们所有细节，但早懂它们在实际政治里的有用部分。先秦的《姜太公六韬》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这句话，很形象地表达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意义。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教人远离神。用胡适用语，就是让人“唯物”。马克思理论更复杂一些，但宗旨一样。只不过马克思比胡适、孔子等都更极端。

这些主义、主流思想等看似丰富多样，其实都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而设计。从君王或共产党政府角度看，如果老百姓都把现实利益当作最高追求，国家就容易治理。因为君王和共产党政府都可以控制现实里一切，包括官位、金钱、土地、美女、房产等。人民崇拜它们，统治者控制它们，统治者也就控制了人民。如果老百姓崇拜神，神在人心里，统治者不可能直接控制，统治者也就很难控制老百姓。

老百姓崇拜神，统治者难以控制。

(Exp. 1)

面对逐利、或称“唯物”的人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包括著名的商鞅、韩非子等，总结出一套最有效的治理方法，就是近年来很多人讨论的“驭民术”，写在《商君书》里。简单讲有两个要点。一是霸道，所谓“霸者以力”。君王要有能够压制竞争对手的暴力作为后盾。二是“利出一孔”，就是君王控制全社会所有资源，包括控制谁当官谁下野、谁发财谁破产、谁得荣誉和名声谁名誉扫地等。驭民术本质就是引言中那个猎人抓捕猴子的要点。一要保证猴子打不过自己，二要确保附近没有其他食物来源，猴子要得到食物就必须把手伸进猎人布下的圈套。

法家驭民术要成功，就需要老百姓唯物。如果老百姓不唯物——不怕死，认为死后自己可以进天堂，也不在乎功名利禄——驭民术的两个要点就都失效了。汉武帝看懂这点，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能有正

当理由。比如让墨家去研究鬼神吧，我们儒家不搞那一套。术业有专攻，这本不算错。但独尊儒术后，情况有根本改变。汉王朝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远离鬼神，必然造成全社会唯物。从此朝廷外儒内法，儒法一家。儒家负责教育人民唯物。法家负责撰写规则，专门治理唯物的人民。儒法相辅相成，让包含驭民术和“远鬼神”观念在内的专制统治术在中国平稳延续两千年。在近代，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扎根，就是因为国人把它看成这套古老的本土统治术的现代加强版。

驭民术成功，需要老百姓唯物。

(Exp. 2)

长期施行法家驭民术必然导致统治者控制所有社会资源，老百姓一无所有，万事都依赖统治者施舍。于是国家独裁专制，老百姓没有基本权利。如果老百姓不乞求统治者也能过上好生活，很多精英就会从体制中出走，如范蠡与西施，去过自由自在的桃花源式生活。那样的话，统治者影响力降低、地位不牢靠，所以他要尽力杜绝。只有当体制外的人都活得猪狗不如，无论他多么聪明有才能，精英们才不得不匍匐于权杖之下，争先恐后乞求统治者施舍。这都是东亚式专制独裁的恶毒本质。

唯物的人与动物无异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认为人都是动物。更贴近生活的说法，人特别唯物，就与动物无异。卢梭认为人本质就是自私，一要生存，二要生存得更好。其实动物就是如此。马克思继承了卢梭，两人在这点上大同小异。主流国人追求现实中的幸福感，看似比动物复杂，但究其本质，也是第一要生存、第二要生存得更好。这种人生观表现在社会行为里，就是功利主义。

唯物的人像动物，社会行为遵循功利主义。

(Exp. 3)

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里猎人抓猴子，我觉得猴子傻。但现在想想，我发现它其实很聪明，而且想得深远。猴子早知道，被人抓住后，只要自己服帖，人不会杀自己。中国峨眉山的猴子也如此，围着人转，不但没危险，还讨到很多吃的。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独裁专制下，已积累很多相关智慧。即使文革 2.0 来了，他们也不害怕，因为知道只要自己低调，一般不会被整，地位房子财产等都能保住，下半辈子不会受大冲击。如果自己乖巧，还可能从法力无边的政府手里得到更多好处，比如官位更高，房子更大、或地段更好等。

正因为猴子聪明，原始人的简单阳谋才可能有效。非洲羚羊也是大型哺乳动物，也打不过人，但没有猴子那么聪明。远远闻到人气味就吓得逃跑了，没机会觊觎圈套里的诱饵，人也就不能靠圈套抓到它。中国人平均智商在世界上算非常高，却被法家简单的驭民术管得服服帖帖。那些平均智商远低于国人的民族，比如一些太平洋岛国人，反而活得自由自在。他们看到谁强大暴虐，就会逃跑。不像聪明的中国人，总想在帝王庇护下当官发财，觉得帝王越暴虐就代表他越强大；他越强大，他的庇护就越可靠，越有利于我当官发财，我就觉得他越伟大。

猴子被抓，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聪明。

(Exp. 4)

古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认为二者都追求利益，本质一样。动物稍微简单，只要食物。而唯物的人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帝王们争夺天下时，比如六四天安门平叛阶段，广大英杰们都在审时度势，就像猴子在暗中观察猎人布圈套。看准猎人放进食物后，猴子就会小心翼翼地接近，然后把手伸进来抓。就像六四尘埃落定后，各路英杰都小心翼翼地与政府和好，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当官发财，比如画家范曾、还有那些争先恐后回国赚钱的六四学生领袖们。

猎人大摇大摆抓猴子，猴子嘶叫几声，但实际上愿意为掌心里的食物接受脖子上的绳索。类似地，中共发动文革 2.0，关门打狗。天下英杰们在网上抱怨几声，但心里早想好，你让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我全听你的，还不行吗？他们实质上愿意为官位、房产、家庭团聚等去做暴政的奴才。非洲人抓猴子，一个简单办法用了千百年，依然有效。类似地，从商鞅到如今的两千多年来，帝王与英杰们一直在玩儿同一个驭民术游戏，剧本从来不变，结果都一样，只是演员一代换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套驭民术成功的根本在于，老百姓经过认真考虑后，真心实意甘愿为现实利益放弃自由。

第四章 为什么国人不崇尚自由？

不久前在网上，几位海外同学群聊时谈到信仰。我讲人活着不能没有终极目标，像海上航行的船不能没有方向。一位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同学回应，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就是快乐。几位在欧洲的同学马上表示认同。我说任何称职的船长都不会说，船头指向哪儿我就往哪儿航行。纯粹属于船上的东西都不能作为船的方向指南。同理，快乐完全属于个人，可以是人生附带结果，但不应该是终极目标。一位在加拿大的同学说，劝人不为快乐而活，都是伪善、骗人。他话里藏着锋芒。

大陆出身的知识精英们普遍把人生幸福、事业成功等，看作最高奋斗目标。很多人已经哲学化，他们觉得所有人都如此，包括家里长辈、身边熟人等。他们看不出任何人不是这样，也想象不出人可能有其他最高目的，所以觉得这是天经地义，不但人都如此，而且人都应该如此。如果有谁不同意，他们就觉得不可理喻，然后推断那个人肯定在装、撒谎、骗人。与崇尚幸福的人生观相对应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唯物论、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或这几样的排列组合。严格说，这些哲学门派之间有区别。但在一般国人头脑里，它们代表的意思都一样，就是人本质是动物，活着就为了过得好。

这些观念深入国人骨髓，蒙蔽他们双眼，让他们看不到简单的事实。在中国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几乎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等，都要求人把目光放得高远，超越现实利益或快乐。世界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23 年调查发现，只有 3% 的美国人是无神论者。根据欧盟官方统计

(Eurobarometer 2015)，约 10%的欧盟人、13%的英国人是无神论者。欧美人普遍信仰神，其中基督教最多。上面几位同学都已在欧美定居几十年，却没发现身边绝大多数本地人不同意他们的观念，不把利益或快乐当作人生最高目标。

我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一文中谈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是基督徒之间的一套社会政治规则。国人不理解基督教基本观念，就不能理解自由民主的精髓【13】【15】。这些海外同学受过良好教育，很多有博士学位，从事体面工作，平时阅读量大，信息灵通，人也爱思考，却依然没看懂所处社会的主流信仰。可想而知，一辈子不出国、被无神论包围的普通国人就更难了。其实在近一百多年里，中国顶级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等，都没有理解在西方占主流的基督教，无知程度令人惊讶。所以我要对比主流国人与主流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希望帮助读者看清楚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屡试屡败的根本原因。

效益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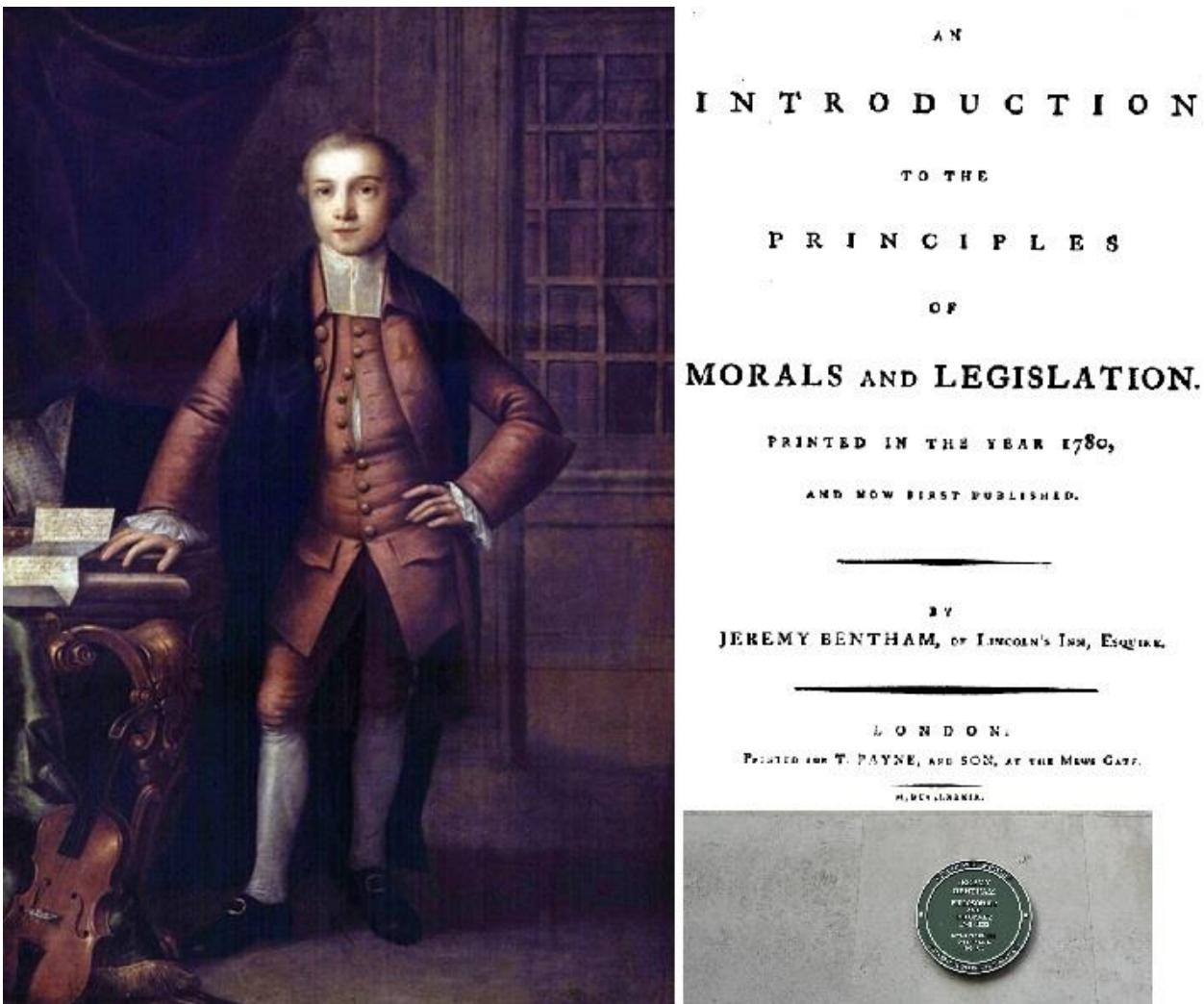


图 12.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社会改革家，效益主义哲学 (Utilitarianism) 创始者。他出生在伦敦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成功的律师，母亲是富商之女。他儿时是神童，据说蹒跚学步时阅读英格兰历史，3岁学习拉丁文，7岁独奏小提琴曲等。他童年时不去学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学习，造成他没朋友，体弱多病。后世研究者认为他患有亚斯伯格症。成年后他在牛津大学主修法律，变得身体健壮。但他毕业后没做律师，成了法律评论家，哲学家，积极支持社会改革。他一生勤于写作，著作等身，很年轻时就名声大噪。他曾与多位女士有染，但从未结婚。右上是他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右下是他的故居原址，位于伦敦市中心，现为伦敦大学学院校园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强烈影响了这所大学的创立和办学理念。他被公认为当时少见的无神论者，但他本人从未承认。

18世纪末，边沁首次提出效益主义，原希望描述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的决策过程，但不太成功。这套理论至少不适用于基督徒。后来人们把它用在微观经济学里，描述经济领域内个人决策过程，效果很好。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之一。

但边沁效益主义贴切地描述了主流国人内心世界。他认为人总追求在可行范围内获得最大幸福感。写成数学公式：

$$\text{目标函数: } \text{Max}(\text{幸福感}) \quad (\text{Exp. 5})$$

必须满足: 自身条件、社会限制、物理法则等 $\quad (\text{Exp. 6})$

他把人的决策问题转换成最优化数学问题。其中效益(Utility)就是人的幸福感，或称净快乐 = 快乐 - 痛苦。比如人决定是否移民，先想象移民和不移民两种情况下自己的总体感受，包括快乐和痛苦，然后选择净快乐最多的那个。

边沁进一步发现，效益都可以数量化，并且来自不同源头的效益可以相加。于是我们把人的总效益按源头分成两类，一是社会性效益，包括基于地位、财富、名声等的幸福感，其源头都是社会性的。二是私人性效益，包括基于衣、食、住、行、色、玩等的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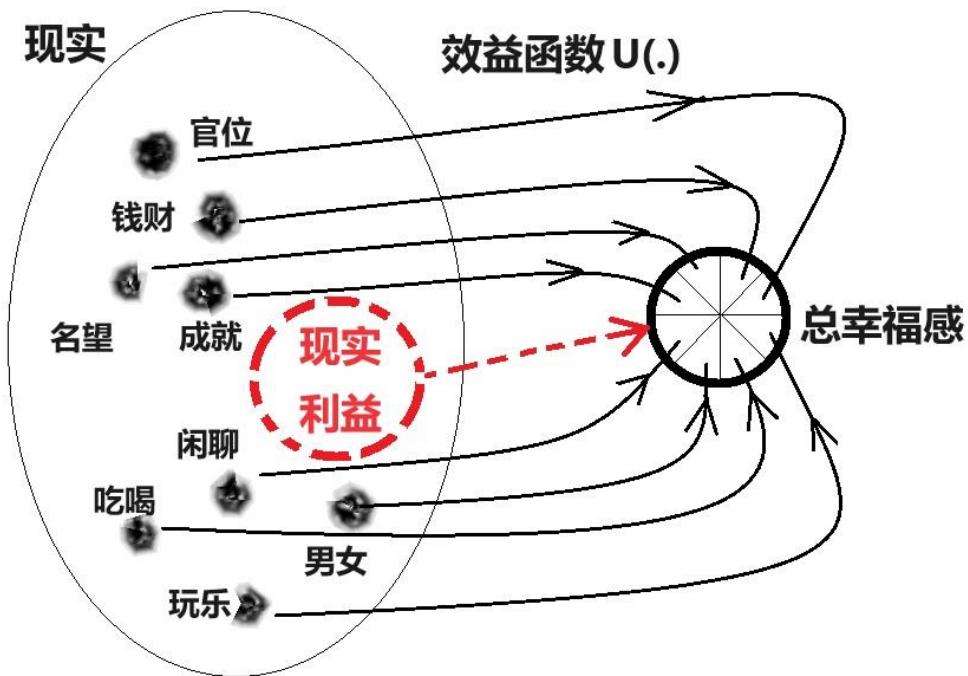


图 13. 图解“现实利益”。现实利益是虚拟的，对应总幸福感。

“现实利益”是人们在生活中常讲到和想到的概念。比如有人会说，“虽然他一年工资只有 20 万，但他手里有权、办事方便，相当于一年赚 200 万”。他并没真赚 200 万，所以这

个 200 万是虚拟的，对应的幸福感相当于 20 万工资加其他权力和方便。幸福感的来源多样，不能直接相加或相互比较，比如一个官位与一份财产。只有都转换成人心中的幸福感之后，它们才可能相加或相比较。但幸福感不直观，不方便人与人交流。所以人们经常把幸福感折算成虚拟的“现实利益”。现实利益、或简称“利益”，与总效益一一对应，互为增函数。“现实利益最大化”就是“效益最大化”、或“幸福感最大化”。

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是效益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享乐主义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过增加私人性效益来实现。比如有些人到中年，发现自己的官位、财富、和社会名望等都很难再有大变化，社会性效益近似恒定，于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时间等都用在私人领域，专注衣、食、住、行、色、喝酒打牌等。这些人就是享乐主义者。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效益主义的另一种特殊情况。与享乐主义相反，功利主义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过增加社会性效益来实现。比如很多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没条件享乐，觉得一生幸福都依赖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包括高考成绩、各种竞赛成绩、在校时的荣誉等，于是发奋图强，把绝大部分精力、时间等用在最大化社会性效益上。再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身为君王，有条件吃喝玩乐，但满怀雪耻决心，拒绝任何享乐，专注练兵备战，要夺回君王的荣耀。

大陆哲学界有人把 Utilitarianism 翻译成功利主义，我认为不妥。“功利”指“功名利禄”，全来自社会。而边沁理论既涵盖社会性效益，也涵盖私人性效益。所以我用“效益主义”代表 Utilitarianism，用“功利主义”代表强调社会性效益的效益主义，是效益主义中一种特殊情况。以前我曾在多篇文章里谈及功利主义、以及它与 Utilitarianism 之间的关系，现在终于找到机会做个全面说明【7】【10】【11】【13】【14】。

理性决策就是求最优化解

表达式(Exps. 5, 6)可以写成标准最优化方程组：

$$\max_n U(n) \quad (\text{Exp. 7})$$

$$s.t. z_k(n) \leq B_k; \text{ for } k = 1, 2, \dots K \quad (\text{Exp. 8})$$

其中 $U(\cdot)$ 是个人的效益方程。 n 是决策变量，可能是连续的，比如决定把多少时间花在工作上；也可以是离散的，比如决定是否移民北美、是否结婚等。公式中包括从 1 到 K 个约束条件， $z_k(\cdot)$ 是约束方程， B_k 是上限常数。为方便讲解，以下用移民决策作为例子， $n = 1$ 代表移民， $n = 0$ 代表不移民。

稍有数学常识就知道，上述方程组的最优解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mathbf{n}^* = \mathbf{F}(\mathbf{U}(\cdot), \dots, \mathbf{z}_k(\cdot), \mathbf{B}_k, \dots) \quad (\text{Exp. 9})$$

等式右侧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在人思想之外，属现实范畴，统称为“外部因素”，在人做决策时都已知。(Exp. 9)包含一个在数学上很简单、但在哲学上意义重大的结论：

如果效益主义者是理性的，他的决策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 (Exp. 10)

其等价说法：

在旁人看来，理性效益主义者的自由意志如同不存在。 (Exp. 11)

或：

在旁人看来，理性效益主义者如同机器或动物。 (Exp. 12)

人的决策完全被外部因素决定，是“决定论”(Determinism)哲学的核心。理性效益主义符合决定论，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如同不存在。

理工科出身的读者可以把(Exp. 9)想象成一个“芯片”的输入输出方程。其等号左侧是输出信号，右侧是输入信号阵列。人就像这个芯片，其决策就是芯片输出信号，完全被来自芯片之外的输入信号阵列决定。人的自由意志不在输入信号里，不影响决策。

对于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本身理性、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决策者，比如一位明君或好的国家首脑，如果他治下的所有人都是效益主义者，那么(Exp. 9)有个含义：

在效益主义社会里，好政府应该忽视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Exp. 13)

有两个原因。第一，即使纯个人决策，本人对政府也没有优势。决策所需所有信息都是外部因素，政府都可以知道。但个人经常不理性，政府相对有优势。换一种说法，政府可以保护个人免受他对自己的伤害。

第二，相对于个人，政府天生占据道德高地。政府为全民着想，个人为自己一个。即使二者都掌握全面信息、都理性，当出现意见不同时，道义上应该以政府为准。

苏联斯大林体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以(Exp. 13)为原则处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们把人当作螺丝钉，不给个人决策权。比如在安排工作时以国家需要为准，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原则上不考虑他自己的意愿。可见，

如果人人都是效益主义者，那么自由民主就丧失了现实和道义基础。 (Exp. 14)

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把动物看成机械。马克思更进一步，把人看成动物，当然人也就成了机械。马克思唯物主义隐含的决定论比理性效益主义更进一步。后者认为，人理性考虑重大问题时，他的最终选择被外界因素决定。但人经常不理性，尤其是面对生活中数量众多的琐碎事务时。而前者认为人的每个念头、潜意识里的每个波动，都被物质世界决定，人一点自主意识也没有。苏联和中国的学校都强调巴甫洛夫的狗流口水实验。流口水是潜意识行为。他们利用这个实验结果向孩子们灌输唯物主义观念，包括人是动物，动物如同机械等。

效益主义社会里的自由

即使老百姓都是效益主义者，由于缺乏个人自由，他们与独裁专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原因主要有三种：

1. 假设政府善意和理性，为全民利益考虑；但个人为自己利益考虑，双方会有矛盾。
比如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修路征地，被征地者趁机漫天要价，侵害社会利益以自肥。历史上著名事例如清末四川保路运动，非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投机股票失败，造成巨额亏空。清政府从大局出发，愿收购公司成为国有。但地方股东为自己利益，以造反为要挟，要求中央政府出钱填补公司亏空。
2. 假设政府善意和理性，但很多个人非理性，双方会有矛盾，类似理性父母与不成熟孩子之间的矛盾。1986 和 1989 学潮里，学生们都有过很多不理性、不成熟的言行。尤其 86 学潮，胡闹成分很高。
3. 政府恶毒，假公济私，自然与老百姓出现矛盾。这类例子非常多，比如政府财政吃紧，就借冠冕堂皇的虚假借口，大肆罚款、倒查税务 30 年等。再比如政府实际为提高汽车销量，却谎称为大众安全，大肆没收老百姓的电动车等。

有选择总是好，所以效益主义者们也喜欢自由，他们与限制自由的独裁专制政府也会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足以促成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因为自由在效益主义者眼里价值不够高，他们不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在效益主义者看来，自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间接的，自由的价值有限。比如移民自由的价值最终在于出国后可能得到的高工资、大房子等。但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必须付出代价，包括承受风险、长时间等待、付出精力等。移民自由的价值不可能高于最终兑现的高工资和大房子的价值。

自由只间接影响幸福感。

(Exp. 15)

现在中国已脱离赤贫，理性的人一般不会把高工资和大房子当信仰，或为它们拼命，更不会要求把它们当作立国之本。自由对效益主义者的价值比它们还低。以我个人经验，身边朋友们喜欢西方自由民主，懂得移民可让自己逃离文革 2.0，但依然觉得自由不如北京、

上海、或深圳市中心一套房更宝贵。当然，总有人把自由看得高一些，有人看得低一些。平均下来，他们对自由的估价大约与大城市里一个精装修卫生间差不多。

对于效益主义者，自由的价值有限。

(Exp. 16)

移民自由明显包含经济价值。那些核心公民政治自由，比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选举权等，在理性效益主义者眼里，价值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还远不如移民自由。所以他们不会把自由当信仰，不会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更不会认为它应该成为立国之本。如果他们嘴上说愿意，那就是撒谎。六四运动中各地大学生都打出横幅，“不自由毋宁死”。但真面对镇压时，没一个愿意赴死，生动说明了这点。

效益主义者喜好自由，但不足以支撑自由民主制度。

(Exp. 17)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原名宪政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把个人自由作为立国之本，利用民主政治和法治作为工具保护个人自由。全体人民、整个政府，如此推崇自由，要求自由的价值必须超过其他一切现实里的东西，比如人的生命与财产，否则它不值得被如此推崇。但效益主义者们把自由看作财产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所以他们组成的社会不适合、不应该、也缺乏内在动力去创立、并维持现代自由民主制度。

第五章 对比效益主义者与基督徒

中国主流精英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人生观是效益主义。与之对比，西方主流精英信神，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自基督教。我在《自由的人性观基础》一文中介绍过基督徒的人心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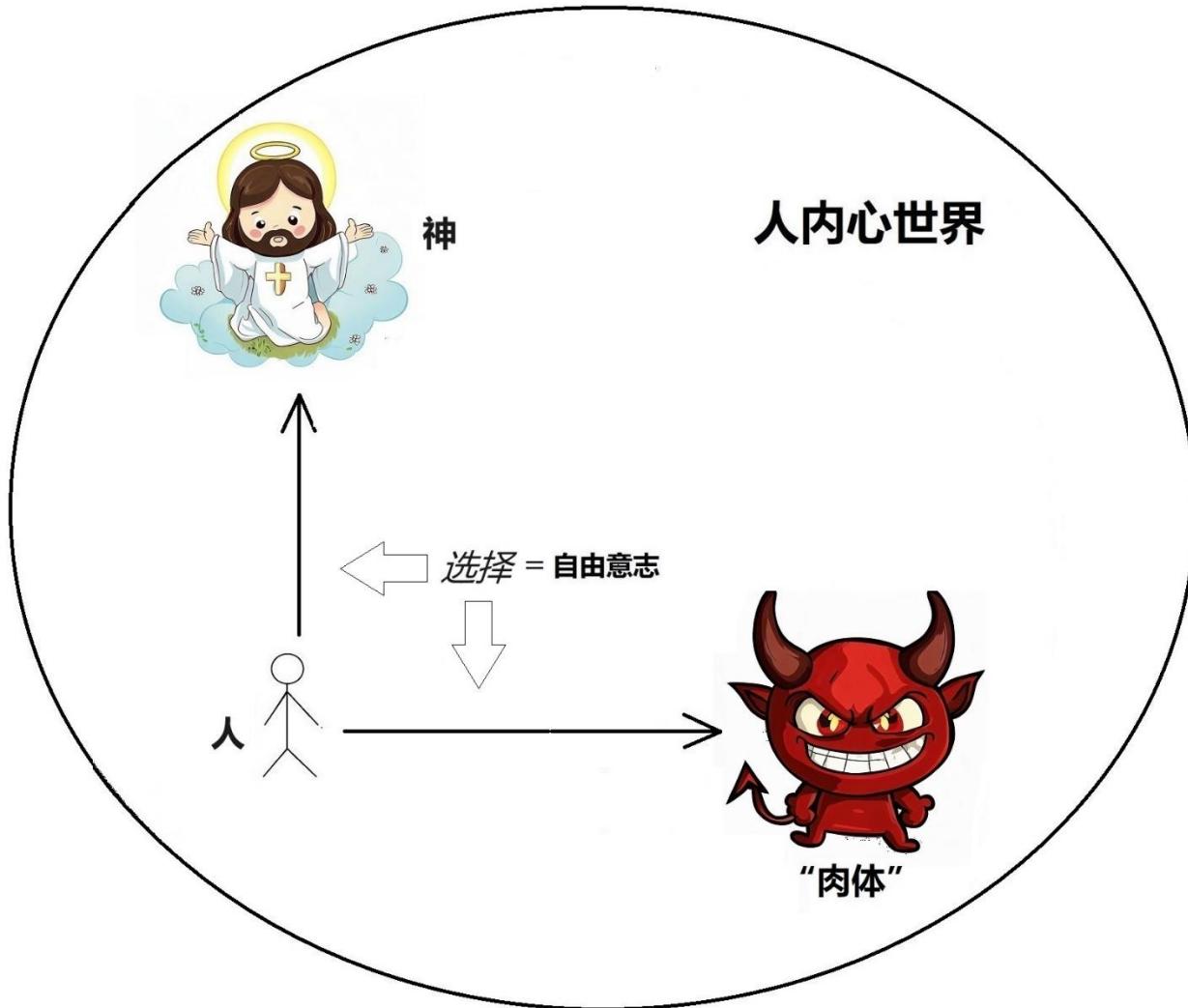


图 14. 《圣经》中基督徒内心模型，参见《罗马书》第 7、8 章，和《加拉太书》第 5 章。近现代几乎所有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定义与分析，都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做修改，包括那些反基督教流派，比如边沁的效益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图中的神代表真善美、正义、爱等，也可被称为圣灵或耶稣。肉体不仅代表人身体，也代表整个现实世界，因为现实必通过肉体影响人。

边沁的效益主义属于无神论，删除了上图模型中的 y 轴。但它印证了模型中另一个关键点。现实中事务千奇百怪，但模型只用“肉体”一项代表整个现实。合理吗？为什么看似无限复杂的现实在人心中可以被浓缩成单一概念？边沁给出答案。他认为现实对于人的根本意义是其带给人的幸福感，具体事务给人的幸福感都可以用实数代表。于是在人心里，现实就是个实数轴，是一维空间，每件事都是这个数轴上的一点。两千年前成书的《圣经》讲到的“肉体”，就是边沁理论里这个实数轴。

效益主义者的内心世界是一维，基督徒的内心世界是二维。 (Exp. 18)

图中神与肉体之间的选择，是基督徒最根本的自由，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中个人政治自由的源头。它本质上只涉及人与神，与现实中其他人和事都无关。它们可能干扰人的选择，比如诱惑人、教唆人做坏事等，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人自己。现实不可能越过人剥夺这个自由。

神给人的自由，他人无法剥夺。 (Exp. 19)

神爱人，所以给人自由。但神也是公平的，同时赋予人责任。人要处理好这个自由并不容易，不像在咖啡店里选摩卡或拿铁，只要自己喜欢就行。神要求人选神，但人天生喜欢肉体，就是追求现实中的幸福。任何人不跟随神、追随肉体，就是堕落，就是效益主义者，他人就可以通过肉体奴役他，如两千年来相信“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国人，要么处于乱世、生命财产不保，要么被奴役。基督徒如果忘记神，也是效益主义者，言行与不信神的人没什么两样。

人堕落、远离神，就成为效益主义者。 (Exp. 20)

所以人要依赖信仰，抵御肉体诱惑，坚决选择神，保护神给人的自由。信神让人无所畏惧。耶稣本人和历史上众多基督徒，如彼得和保罗，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时，都坚信神，甘愿受难、甘愿赴死。历史上，这种勇敢让神的信徒们挣脱奴役的枷锁，获得自由。《圣经》中记载，大约 3500 年前，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淡忘了神，逆来顺受。摩西带领他们重新信神，逃离埃及，获得民族解放。400 多年前，英国清教徒极端虔诚，为按自己的方式崇拜神，抛弃家乡安逸生活，不惧疾病、死亡威胁等，来到北美马赛诸塞湾，建立以清教徒信仰为基础的殖民地，不但获得自由，也为后世留下现代自由民主的雏形。

个人自由、民族解放，最终都依靠信仰。 (Exp. 21)

基督徒的首要责任是选择，效益主义者的首要责任是计算。基督教最重要的特质是坚定，效益主义者最重要的特质是聪明。基督徒当然也需要利益，但利益在信仰之下，听命于信仰，为信仰服务。在效益主义者看来，自由像金融期权，价值有限，不值得人为它放弃一切。基督徒追求神就需要自由，自由是信仰的必要条件。因为信仰高过现实中一切，所以自由无价，或者价值无限高。因此他们理性地、心甘情愿地，为自由抛头颅洒热血。

在坚定的基督徒眼里，自由价值无限高。 (Exp. 22)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就是由这样的基督徒创立的，也是由这样的基督徒维护才延续至今。那些定居在欧美的无神论同学们可能反驳，“我就不信神，也是自由民主制度里的合格公民，对社会的贡献、交的税等，一点不比基督徒少。自由民主制度依靠我这样的公民也能运行，不需要基督教或基督徒”。自由民主社会就像一架喷气客机，创建自由民主就像制造客机，维持它就像维持客机正常飞行，基督教精神就像航空科技，基督徒就像懂得航空

科技的工程师。没有航空科技和工程师，喷气客机不可能被造出来，也不可能正常飞行。自由民主制度里的无神论者类似不懂航空科技的乘客、空姐、或波音公司的会计、门卫、甚至 CEO。他们的作用也重要，但只靠他们造不出飞机；别人造出飞机后，只靠他们也无法维持飞机长久稳定飞行。

边沁的学生，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试图扩展边沁的效益主义，同时涵盖神与现实。密尔虔诚信仰神，迥异于倾向无神论的边沁。密尔认为幸福分高级与低级，低级幸福无论如何累加，也不会达到或超越高级幸福。按他的理论，人从神得到的幸福是高级的，从肉体得到的幸福是低级的。经过密尔改进过的效益主义在一些特殊领域里取得成功，但总体还是失败了，侧面印证基督教基本教义，圣灵与肉体势不两立，人心本质二维，不可进一步简化。

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推崇密尔，包括胡适。密尔名著《论自由》是现代英美自由概念的基础。胡适讨论自由问题时常以他的只言片语为依据【21】。可惜，胡适错误理解了密尔。

《论自由》的核心问题是大众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如何划分。密尔假设主权已经在民、社会已经实现法治。胡适面对的中国，主权还没有在民、社会还没有实现法治。所以《论自由》中的很多结论不适用中国。胡适没看懂这点，经常断章取义，贻笑大方。胡适的哲学修养之差，令人难以置信。根本原因是他虽然推崇英美，政治上完全投靠美国，却不理解英美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基础。

效益主义者很难理解基督徒，因为前者内心世界是一维的，而后者在二维空间里思考。前者看所有事，最终都归结到现实利益。后者不但想到利益，还想到超越利益范畴的神。前文讲到中西交流百年来，中国精英不理解西方主流，其中最大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中国人知道，西方人经常不理解中国人。但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对西方人内心更无知，无知到不知道自己无知。比如胡适算中国人里的“大聪明”，与很多美国基督徒长期交往，却不能理解西方主流思想。读他的“新十诫”和他与英国基督徒女作家谢福芸在火车上的对话，你会活灵灵地感受到他的局限。谈到东西方基督徒烈士们，他完全不能理解，显得狭隘、愚昧、又非常傲慢。他相信唯物，就是“唯有物质”，头脑里只有现实这一个维度。

我讨论胡适，因为他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平。他的专业是哲学，留学美国多年，被认为学贯中西。1949年前曾有很多学者言必称胡适。改革开放后，胡适又在学术界时髦起来。毛泽东说过，“胡适在旧社会一度被当成圣人”。但他对重大问题的论述经常暴露他的肤浅，对西方神学与主流唯心主义哲学他完全陌生。他哲学思想低劣，他自己的责任不可推卸，但更重要的责任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怎么把这样一位平庸的人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中国学界和社会评价人、奖罚人的体系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学风不正的责任推给政府，但这个责任不止于政府，更在于整个知识界和社会里所有人。

胡适的新十诫

1. 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
2. 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 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 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 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序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 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 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寻求出来的。
9. 则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图 15. 1923 年，胡适(1891—1962)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不久，为丁文江的《科学与人生观》作序，写下自己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轮廓”，后简称为“胡适的新十诫”【20】。

为什么效益主义错了

“人的内心真是二维吗？除了广义幸福感，人还有其他追求吗？我不信基督教，我内心也是二维？”生活中我有很多相信无神论的朋友，他们聪明自信，相信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就是快乐地活着，认为信神的人要么头脑太简单、要么虚伪骗人。这节为他们而写，目的不是证明神存在——没人能向第三者证明神存在，每个人必须在心里遇到神——但基督教是真理，代表它的教义是对的，无论你是谁。我想向他们证明，你自称人天生就是追求快乐，其实你不了解自己，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试想有一天，小说《1984》里的情节变成现实，法律要求每个人必须承认 $2 + 3 = 7$ 。每本教科书都这么写，每个老师都这么教。如果谁违反，他和他全家都会被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将如何选择？极少数人会不服软，然后被斩草除根，类似 1949 年后被杀的一些辛亥革命老英雄。另一些“精英”会大力鼓吹 $2 + 3$ 就等于 7，只有不爱国、智商低的人才认为等于 5。他们类似今天的张维为。我大概会服软，嘴上承认，纸上也承认，只要在

外人面前我都承认 $2 + 3 = 7$ 。我无力抵抗整个国家机器，不想让自己或家人倒霉。但是，在心里我会永远认为 $2 + 3 = 5$ ，即使我完全懂，知道 $2 + 3 = 5$ 不是 7 这件事，对我没一点好处，稍不小心就将惹来杀身灭门之祸。

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即使嘴上服软，心里永远认为 $2 + 3 = 5$ 、不等于 7 。这其中有个哲学问题：“人知道 $2 + 3 = 5$ ，不等于 7 ” 这件事为什么发生了？或者问，在明显没有好处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知道 $2 + 3 = 5$ ，不是 7 ？这证明人的选择并不总依据最大幸福原则。效益主义不能完全描述人，不足以作为智者的人生观。

在正常社会里，人知道 $2 + 3 = 5$ 、不等于 7 ，总体对人有好处，因为这个知识在现实中有用；在《1984》那样的扭曲社会里，知道 $2 + 3 = 5$ 、不等于 7 ，会惹来杀身之祸，总体对人没有好处，但人还是知道。这说明无论是否有好处，人总知道 $2 + 3 = 5$ 、不等于 7 ，这件事与好处无关，独立于利益。二者统计不相关，相互正交。简言之， $2 + 3 = 5$ 这件事，不在利益的维度里，存在于另一个与利益维度正交的维度里。那个维度就是超越现实的维度，可称为真理的维度、彼岸世界、神的世界等，其中包含数学。所以任何人，包括无神论者，内心都是二维的。效益主义和唯物主义忽视了这个维度，所以都是错的。

无神论者的内心也是二维的，即使他们不自知。 (Exp. 23)

无神论者的内心也有神的维度，但那里一片空白，本人平时意识不到它存在。有时在不经意的刹那、或半梦半醒之间、或独自凝望夜空时，人会突然瞥见它的荒芜，于是感到一份惊悚，好奇，又不知所措。就像我家的猫，出生后一直呆在室内。有天家门大开，它看见外面的广阔天地，本可以冲出去，但它却同样惊悚、好奇、不知所措。法国天才数学家和神学家帕斯卡有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神准备的空缺”。这个空缺需要被填补。但“只有那个耶稣揭示的神可以填补，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圣经》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无神论者需要主动祈求、寻找、叩门。类似我家的猫，需要主动和勇敢，才可能冲出去，享受它从未享受过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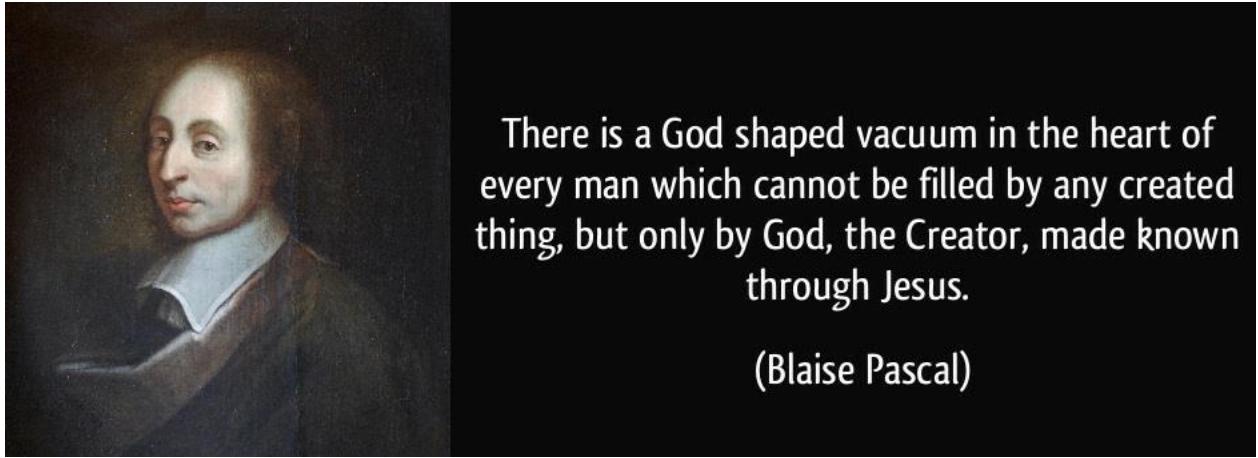


图 16.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神准备的空缺，只有那个耶稣揭示的神可以填补，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帕斯卡是法国数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历史上著名的多领域天才。他在概率论、几何学、代数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计算机语言 PASCAL 以他命名。

人不是动物

只有人能够感受到真理的召唤，其他动物都不能。比如马戏团里的狗可以做算术题，比如 $2 + 3 = 5$ 。最简单的操作是先给狗看 $2 + 3$ 的牌子，然后在数字 5 的牌子上放食物。经过多次训练，狗建立条件反射，只要看到 $2 + 3$ 的牌子，就主动去找 5 号牌，类似巴普洛夫的狗流口水实验。但这与人根本不同。人知道 $2 + 3 = 5$ ，是感知到其内部真理性，并被吸引，与现实中任何东西无关。即使没有好处、可能被杀头，人也知道。狗找到正确答案 5，终极原因是 5 号牌子上面有食物，符合效益主义。如果驯兽员把食物转放在 7 号牌上，不久后狗就去叼 7 号牌。它对正确答案 5 并没有任何内在偏好。实际上，动物的所有行为都由现实驱动

动物行为符合效益主义。

(Exp. 24)



图 17. “聪明的汉斯”和它的主人。1900 年前后，德国出现一匹著名的马，能做各种复杂的算术题。比如面对问题 $3 \times 4 = ?$ ，它就会用蹄子敲打地面 12 下。它的主人坚信它的智力，带它到处表演，轰动一时。著名心理学家丰斯特 (Oskar Pfungst, 1874—1932) 对聪明的汉斯产生好奇心，全面观察研究它，最后发现它并不懂算术，但对人类肢体语言特别敏感。表演时观众们知道答案，并会暗暗计算汉斯敲打地面的次数。等到汉斯敲打到正确次数时，观众会下意识做出各种身体反应。观众自己不察觉，但汉斯看懂了，于是停止敲打，然后接受成功后主人给它的奖赏，比如食物。后来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聪明的汉斯效应”。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动物可以非常聪明，有些方面超过人。

聪明程度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Exp. 25)

但无论动物多么聪明，他总遵循效益主义原则，感受不到真理的内在召唤。只有人的头脑可以认识真理、被真理吸引，所有动物都不能，无论它多么聪明。这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只有人感受到真理的召唤，动物不行。 (Exp. 26)

算术是真理，真理是神的一个方面，就像红色是太阳的一个方面。太阳是红的、圆的、热的。类似地，神是一个整体，同时是真理、爱、善、正义、美等。本文从真理角度讨论神。更广泛地讲：

只有人可以认识神、被神吸引，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Exp.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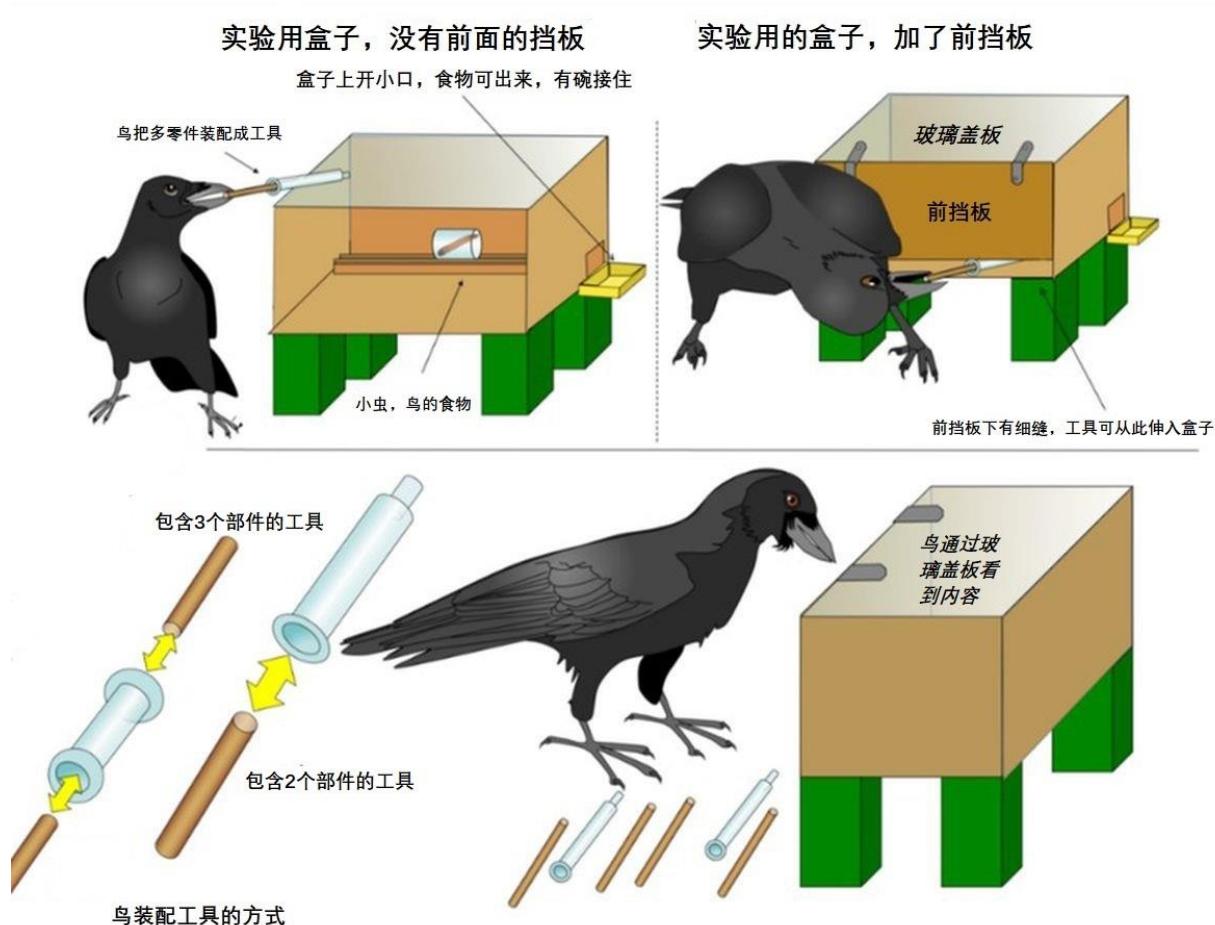


图 18.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定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不一定是人。新喀里多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外海，属于法国。岛上独有一种鸟，形似乌鸦，叫新喀鸦。科学家们发现它有制造工具的能力。在 2018 年，科学家们又发现它有制造多零件复杂工具的能力。上图描述它根据所处环境的需要，制造出含两到三个部件的复杂工具【3】。图片翻译自 Smithsonian Magazine 专题文章【23】。

如果你相信人是动物，你没资格要求自由民主

几个月前，一位网络大 V 对年轻人发出号召，“趁春天，找自己的配偶，跟猪狗一样，咱们都是动物”，因为春天是动物交配季节。前不久我看到上海街头随机采访视频，一位老

人谈家庭内部关系，为了争夺财产，他家里兄弟、父子、母女之间互不相让，互为仇敌。他发自肺腑地感叹，“人就是动物啊，很多人连动物都不如！什么血缘、家人感情，在利益面前都是假的！”

在当代中国，几乎人人接受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从国家最高层、到市井小民，从大学讲堂、到专业哲学刊物，从朋友之间的家常，到临终者的人生总结，大家都觉得所有人都是动物，自己是动物，自己亲人也是动物。我认识的六四积极分子们也同样认为人是动物。似乎没人注意到这种观念多么不寻常。在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在世界其他国家，几乎无人认同。更何况把爱情与动物交配混为一谈、把利益看得高过家人感情，荒谬到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人是动物，独裁专制就是对的，自由民主就不合理。动物的本质是机械。野生动物虽然自己做决定，但所谓“鸟为食亡”，它们遵守效益主义原则，客观看也是机械性的。如果把人完全当作机械，那么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制度等，就是最合理的。那时政府控制一切，把人看成螺丝钉，不考虑个人意愿，不给人自由。如果这样做给政府造成麻烦、效率太低，那么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总体维持专制独裁制度，政府继续把控所有大事决策权，比如官员选任，但将琐碎事务自主权下放给个人，比如每月定额细粮中多少比例买大米、多少比例买面粉。剧变前的东欧各国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等的改革运动，本质就如此，类似养鸡场为提高产蛋量，给鸡少许放风时间，但养鸡场主人继续把持生杀大权。改革开放十年后六四爆发，就是因为人民不满足于这种养鸡场式改革，要求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

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极力向国民灌输人是动物、无神论等观念，就是为独裁专制保驾护航。六四运动参与者们，包括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反对独裁专制，同时却认为人是动物、相信无神论。他们自相矛盾，但多数人还没意识到。

谁信仰自由？

裴多菲的诗《自由》在整个 1980 年代都非常流行，在大学生里尽人皆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六四期间，大家在讨论时经常借用诗里的话互相勉励，表达不达自由决不罢休的精神。后来北京示威游行学生喊出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有的还打出英文原文作为标语，“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上海学生也照样学。这是在 1775 年独立战争前，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为支持与英国开战，在演讲中喊出的名句。



图 19. 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 中文译者殷夫(1909—1931); 《自由》的中文翻译，裴多菲最著名作品，由殷夫亲书。裴多菲是匈牙利诗人、革命者、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匈牙利爆发独立运动，试图摆脱奥地利王朝统治。裴多菲在革命前创作这首诗，但不久后战死疆场，年仅26岁。殷夫本名徐孝杰，浙江象山人，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被处死时年仅21岁。鲁迅在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记录了他与殷夫的交往。裴多菲原文直译是“自由与爱情，二者我都要。但为了爱情我愿放弃生命，为了自由我愿牺牲爱情”。殷夫的翻译属于再创作，非常成功，在中国家喻户晓。

六四北京开枪后，运动领袖和名人们跑得最快，因为他们在国内外都有关系，有跑的条件，普通六四参与者没有。不久后局势明朗，强硬派大胜。那些曾支持运动的大人物们纷纷选择沉默、顺从、写检讨、表忠心，如万里、范曾等。一般群众也类似。开枪之后几天，上海学生继续示威，但口号不再是“不自由毋宁死”，而变成“不要秋后算账”。大家趁运动末尾，希望把运动的最后一点能量转化成谈判筹码，要求政府不要找自己麻烦。形似强硬，实为乞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全国上下没有谁愿意为自由赴死。不要说赴死，就连不服软的都极少。总之，政府客气时，支持运动的人们就强硬，口号喊得震天响；政府硬起来，大家都软了，抗议阵营快速崩溃。

六四后身边老师和同学们都写检讨，但私下里表达不满，说自己被逼迫，不得不口是心非。但我当时就强烈感到，大家的心口不一不是秋后算账时才开始的。学生们游行时喊的口号、老师们在运动高潮期表现出的支持，同样是假的。大家都非常聪明，喊口号时就知道自己不愿为自由而死，从没觉得自由比生命宝贵。那些支持学运的老师们，社会经验丰富，很多经历过文革，头脑非常清楚。早知道如果运动不成功，政府必将秋后算账，到时自己当然反悔、痛批学运，而且绝不能落人后。反悔和痛批的程度将取决于政府态度。如果政府睁只眼闭只眼，自己就适可而止，比如少点揭发别人，何苦不必要地树敌呢？如

果政府不依不饶，自己就做得狠一些，反正大家都如此。绝大多数人就采取“中庸”策略，就是藏在众人中间，因为知道法不责众。平均讲，人比猴子机灵。

社会大动荡时，所有人本性都显露出来。我那时每天除了接受审查就是思考，仿佛超越时空，来到各种人身边观察他们，情况就变得直白。从中南海到城乡街头，无论是中共高干还是自由派学生，在这个时候都是简单的人，最重视的是自身安全、个人与家庭前途等。学生里没谁还想到裴多菲讴歌的自由和爱情，也没几个人还在乎信仰、主义、理想等。极少数同学反应比别人慢一拍，言行出格。但他们只是一时看不清形势，秋后算账深入后，他们就和周围人一样消停了。中共那边也一样。邓小平会见在北京军以上高级干部，讲的都是大家的身家性命和手里的权力。总之，所有人这时都回归到效益主义者本色。

我有很多朋友是金庸粉丝。金庸和他的读者们都崇尚武术，但都不懂武术。因为都不懂，所以聚在一起谈论武术时，每个人都像专家，没人觉得尴尬，甚至没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类似地，信仰、主义、理想、自由、爱情等，都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外来语，源头都是基督教文化圈，中国古人没这些概念。那些引风气之先、把它们教给大众的文化人，自己也不理解其中深义。一般人只觉得它们都是褒义词，如果外国人有，那么中国人必须自古就有；如果身边其他人都声称有，那么我也要有。但等到真的面对压力，大家都被打回原形，变成只求利益的两脚兽，没人践行自己曾歌颂过的高尚。其实信仰、主义、理想、自由、爱情等都基于神、超越利益，都要求人在必要时牺牲现实利益，甚至生命。特别坚定的基督徒做到了，成为英雄或烈士。一般基督徒推崇他们，但自己经常做不到。国人主流自视动物，认同效益主义，根本没想要做到，更别说真做到了。正因为从来没想过要做到，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不到。

我的很多长辈、老师、同学、朋友们都是平常意义上的好人，老实厚道，让人放心、舒服、与人互利。但在关键时刻、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也是效益主义者，为自身利益、安全等抛弃一切，骨子里与主流一样。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这点，如被人发现他们会不好意思，但没人想改变，大概因为不知如何自我改造。这就是谭嗣同笔下的“乡愿”，意思是看似忠厚，实则屈从流俗。他认为民众乡愿是秦暴政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简单讲，乡愿的老百姓只配独裁专制政体。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孔子宣扬敬鬼神而远之。他虽不虔诚，但知道神存在，也尊敬神，所以能看穿乡愿，并严厉批判它。现代国人不知神，看不懂乡愿的实质，还以为是做人的高境界。更多一般人连乡愿都算不上，直截了当地屈从流俗，做不到老实厚道。

第六章 哲学如何让人退化成动物

中国自由民主之死里求生

未来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流行说法，但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人认为，如果来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中共就会倒台，中国就将民主化。1960年代初，人祸造成大饥荒，几千万老百姓饿死。之后中共不但没倒掉，统治反而更牢固。背后原因很简单。重大经济危机就是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中民众自然呼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让中共又多了一个借口和机会集权。信奉效益主义的人民这时都会发现，中共是所有社会资源之所在，就是“利出一孔”里的那个“孔”。谁更忠于中共，谁就更可能活下来，更可能升官发财。于是他们更争先恐后地拥护中共，维持中共的统治。古今中外的专制政府都懂这点，所以经常故意制造危机。

第二种流行观点，只要发生重大社会冲突，比如2022年10月得北京四通桥事件，如果再搞大一点，习近平就会下台，中国就会自由民主。这个观点里存在多重错误。六四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影响最大的反政府社会冲突，比北京四通桥事件严重好几个数量级。军队开枪后，六四运动迅速溃败，毫无悬念。在可预见的将来，任何社会冲突都不会超越六四，成功的几率比六四还小很多，因为政府已看穿自由派的脆弱。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杀老百姓，活着得人会义愤填膺，站出来反抗中共。但现实是，中共开枪后，效益主义者们算计，中共敢真开枪就代表它真厉害，以后更服它了。



图 20. 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在2022年10月13日。一名抗议者在桥上烧轮胎引人注意，并挂起两条横幅，播放音频，公开反对习近平，称其为“独裁国贼”。事后海外自由派纷纷转发他的口号。左图为两条横幅之一；右图为美国大学校园内响应四通桥事件的小标语。后来有报道，抗议者为彭立发，当场被逮捕，至今被关押。

中国独裁专制回潮，很多人以为是习近平个人因素造成的，比如有人指他教育程度太低等。他们认为只要换个领导人，中国就会大不一样，可能变得自由民主。其实不然，习只

是做了所有理性当权者都会做的事。在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效益主义民情下，如果不接受国家分裂，任何理性主政者都会与习大同小异，包括继续独裁专制，采用中国传统驭民术、西洋来的马克思主义专政理论等。如果谁头脑发热，手段松动，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和混乱，领导人的下场就会类似袁世凯、蒋介石、或赵紫阳。

海外总有人危言耸听，习近平马上就要被推翻了，中共不久就会倒台等。问题是，即使他们说对了，习近平和中共完蛋又如何？习终有一天会离去，比如老朽、死亡，政变等。中共当然也可能下台。到那时中国会有段动荡期，各路人马争权，社会松散，老百姓觉得自由多一点，就像北洋军阀时代、或毛去世后的1980年代。但除非国家分裂，中国不复存在，否则最后总会有一路人马胜出，国家回到稳定的独裁专制。就像北洋之后，经过几十年内乱和混战，毛泽东和中共最终胜出。统治特别唯物的中国人，只有采有独裁专制才可能保持国家长期统一和稳定。

第三，每当谈到自由民主，很多人马上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六四与之相提并论，觉得六四、与未来任何自由民主运动，都是五四的精神延续。其实北洋政府是宪政共和，就是现代自由民主的前身。但五四参与者们觉得它软弱可欺，极力捣乱并反对它。他们不理解、不忠诚于宪政共和，也不珍惜自己的自由和人权。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大力鼓吹中国左转，开展浩浩荡荡的非基督教运动，促成中共成立，以及孙中山按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其实当时的中国精英就是厌恶宪政共和的软弱，呼唤强有力的政权取而代之，不在乎新政权独裁专制。最后国共两党携手北伐，让蒋介石推翻宪政共和，施行军事独裁。简言之，五四以民主为口号，却扼杀了中国的自由民主。民族精神不改，历史还会重演。

第四，很多人以为蒋家的开明和无私造就了台湾民主，大陆如果有自己的蒋经国，也会像台湾那样民主化。其实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是苏联式政党，和中共本质一样，区别只在程度。蒋介石反共，主要因为利益相争，两党信仰没那么不同。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时期，政党制度、军队制度、情治系统、宣传系统等都照抄苏联。蒋经国就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干部。台湾民主化与日本、南韩民主化相似，真正原因都是美国压力。美国要求它们民主化，它们想挡也挡不住。蒋家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次要，且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

第五，中国能否像台湾那样，请美国干预或主导中国民主化？其实这与刘晓波的“全盘西化、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的想法类似。美国曾长期努力主导中国现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从清末到1920年代，大量美国传教士们带着美国基督徒的捐款，进入有点地位的中国人都不愿进入的穷乡僻野，把基督福音与最新医药、科技、文化等现代元素传到中国最基层。二战期间，中美并肩作战，救中国于亡国的边缘。战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希望阻止中国共产化。改革开放后，美国对中国商品敞开大门，让中国从极端贫穷迅速富起来。但是美国最终失败了。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联手后，阻挡了美国的每次努力。简单

讲，中国太大，传统思想太顽固，知识精英陷入马克思主义太深。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也无法像主导台湾那样主导中国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变低。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需要共同敌人，目前就是中国，这个局面将长期难以改变。美国的亚太联盟与其欧洲联盟正逐步融合，也需要共同敌人，也很可能是中国。俄罗斯现在与欧美为敌，与中国关系好。但从长远看，除非它大分裂，否则它唯一战略选择是加入欧美的联盟。因此它需要对欧美展现价值，帮助欧美遏制中国几乎是俄罗斯唯一可行的长期战略选择。类似邓小平时代，中国靠遏制苏联才取悦欧美，换来国家发展机会。简言之，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可收编亚欧，包括俄罗斯。中国作为敌人的价值将升高。中国作为朋友，对美国也有价值。但两国经济正在脱钩，这个价值未来会降低。过去中国弱，美国主导中国事务的意愿强烈，都不能成功。未来中国变强，美国意愿变弱，就更难成功。

总结以上五点，中国自由民主化无法寄希望于偶发事件、伟大领袖、历史遗产、或外国势力，未来之路将非常艰难，没有捷径。但是不是就不可能了？不是，因为人对自由的渴望永远不死，无论他的历史、文化、种族都是什么。即使这代中国人退缩、失败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依然会追求自由。那么中国人最终将依靠谁、依靠什么力量实现自由民主？答案是靠自己、靠正确信仰的力量。真正有民族自尊感的国人，应该向当年登陆马赛诸塞湾的清教徒们看齐，主要靠自己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就需要中国基督教化。有人立刻会说，开什么玩笑？中国基督教化太难、太慢了。我同意，但这一步是关键必要条件，绕不开，所以再难再慢也要做。

鸦片战争在 1842 年结束后，中国总体抛弃传统，转而以西方为师，包括允许基督教会大发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4 年爆发，造成西欧严重衰退。战争于 1918 年结束后，苏联崛起。在 1920 年代初，中国精英看到西方内部不同势头消长，觉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是新兴力量，吸收了前人经验教训，应该更先进，选择它可以让中国避免西方人走过的弯路，于是认定它是未来大趋势。同时他们开始鄙视代表西方旧势力的基督教，并开始大规模打压国内基督教会。中国精英不理解基督教。他们的无知把中国引上歧途，直到今天。

本章首先简略回顾基督教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史。在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百年来一直偷学日本。两国都曾长期禁止基督教，背后原因类似。将两国历史摆在一起，让读者更容易看清中国的问题。第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之母，所有近现代西方哲学门派都源于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思想之树如何生长出马克思的唯物论与无神论？本章将解释在现代科学诞生后，疑神论和无神论学派如何从斯宾诺莎开始、经过休谟、卢梭、边沁等人、最后演绎到马克思的全过程。讨论重点是他们如何定义人和自由。

基督教思想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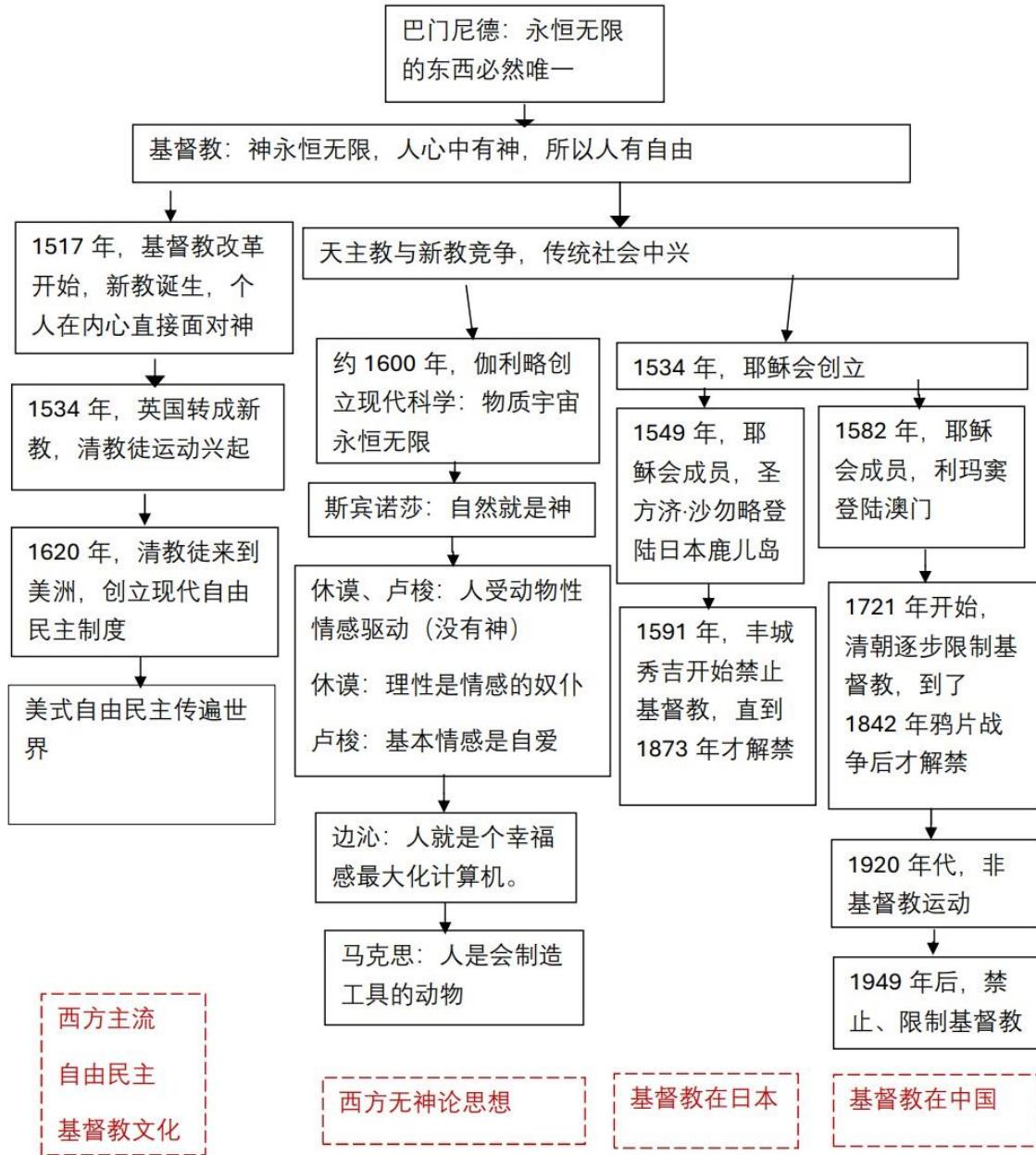


图 21. 基督教思想在东西方发展史示意图，包括西方主流思想、西方无神论、基督教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

基督教其实很早进入东亚，但被传统势力残酷扼杀。1517年，欧洲宗教改革发祥于德意志。西班牙属于反改革阵营。1534年，西班牙残疾退伍军人、天主教士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与几个同伴创立耶稣会，不久后向东方派出传教士。耶稣会成员个人素质极高，给人印象是讲经时是学者，与各国政要打交道时是外交家，工作起来像军人或间谍。

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首次登陆日本，比伽利略创立现代科学、清教徒到达美洲等都早得多。当时日本正处战国时代，社会管理较松散，基督教在战乱中迅速发展，与本地传统势力逐渐产生矛盾。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结束战国时代，随即颁布命令限制、禁止基督教。后来禁教令内容随时间多次变化，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解除，历时250年以上。



图22. 左，1597年“日本二十六圣人”惨案；右，1637-1638年“岛原教案”。丰臣秀吉时代，26位基督徒在长崎被钉上十字架，包括4位西班牙传教士、1位墨西哥修士、1位葡萄牙修士、和20位日本籍信徒，其中3名未成年。“二十六圣人”惨案之后，日本基督徒人数继续增加，于1637年发动岛原反叛，最后被极端残酷地镇压，大约30万基督徒被杀，血流成河。事后江户幕府更严厉禁教，日本基督教遭受重创，几近灭绝。少数教徒转入地下，变成秘密教派生存下来，延续至今。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时都来过中国，但在明初时已灭绝。明后期1582年，耶稣会利玛窦等人登陆澳门，为中国带来西方数学、科学与医学知识，如与徐光启联合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但清朝康熙帝在1721年开始限制基督教，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解禁，历时120多年。总之，从基督教角度看，神从没忘记东方，但东方人排斥神。



图 23. 左，1900 年义和团冲入教堂、乱杀传教士与基督徒。在义和团乱期间，大约 5 万基督徒被杀。右，文革中红卫兵破坏教堂、批斗修女的照片。在上海，1966 年 8 月 23 日，来自交大、上海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对徐家汇天主教堂疯狂打砸抢。该教堂的正式名称是圣依纳爵主教座堂，名字中的“圣依纳爵”就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文革中，几乎所有教堂被关闭，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所有基督徒遭受迫害【19】。

基督教在东亚的发展之路，浸透了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血与泪。那些在日本和中国被杀、被迫害的西方传教士和当地基督徒，怀有与北美清教徒类似的信仰和献身精神。他们没有像北美清教徒那样创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最主要原因是他们遭受传统势力阻挠。他们的肉体被杀或被迫害，精神被故意埋没，被大众忽视和遗忘。中国和日本在近代都变得落后。但从最根本意义上讲，两国都曾有过历史机会，本可以理性接受基督信仰，然后以之为精神基础，发展包括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在内的各项现代文明内容。但两个民族都由于因循守旧，错过了数百年大好时机。最后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才不得不打开国门，期间民族饱受羞辱。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两国都还没有看清这个根本大局。

清朝大规模禁止基督教，始于雍正。他曾在接见西方使团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直到今天，中国官方与很多老百姓都持类似观点，但它经不起推敲。中国之教也好、西洋

之教也好，都贵在真。只要是真理，就必然放之四海而皆准，掌握真理的人有责任把它推广到全世界，让更多人享受真理的沐浴。不同国度的人发现真理可能有先后，但真理本身不分国度。中国古籍《庄子》里讲，“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意思是“配合神明，以天地为准则，养育万物，调和天下”，其精神与视野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哪里分什么中国与西洋？清朝时，国人早已放弃追求真理。他们信奉中国之教，只因它有助于统治，知道它距离真理遥远，没信心它能感召中国之外的人。近现代国人思想狭隘，远逊于华夏先祖。

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矛盾

在中国教科书里，欧洲中世纪因为由教会主导，所以黑暗落后。其实那只是中国知识界的误读。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在中世纪大发展，深度和广度远超历史悠久的中国哲学，铸就了西方文明的灵魂，为后来西方跃升为世界文明领头羊打下坚实基础。很多中世纪建立起来的神学与哲学原则，比如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很多理论，在今天依然是西方社会的思想根基，中国学界到现在还没理解。

在 14 世纪，文艺复兴默默开启，中世纪随之落幕。之后各种内生、和外来新思想层出不穷，尤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和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等创立现代科学体系，冲击传统认知。现代科学基于机械宇宙观(Mechanism)【10】。机械宇宙观有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决定论(Determinism)，即所有事件都由先前存在的原因完全决定。牛顿力学就是个例子。它隐含人可以根据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推算出宇宙在未来或从前任一时刻的状态。因此宇宙独立运行，不需要外部因素参与，包括不需要神。二是时空无限、永恒、且不变。其中无限包括无限大和无限小。但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早就证明，无限、永恒、且不变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存在”。基督教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哲学，认为神体现“存在”的基本性质，其他所有东西都不是，包括时空。可见，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违背。

近现代中国人普遍认同机械宇宙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大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都把它等同于科学本身，以至于他们经常不知道“机械宇宙观”这个名字，而把它直接当作科学本身。比如图 15 中胡适的新十诫就以机械宇宙观为基础，其中前 three 项就是机械宇宙观的总结。毛泽东认为物质无限可分，也是机械宇宙观。中国物理界为响应毛泽东，在文革中推出基于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基本粒子层子模型【6】。钱三强、甚至李政道，都曾为之鼓噪。研究者中后来有 9 人成为中科院院士，如何祚庥。

在现代科学初创时期，几位最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笛卡尔(1596—1650)等，保持头脑清醒，继续坚信神，相信时空和宇宙都有起点，宇宙需要神创造等，因为他们知道机械宇宙观本质是个假设，从未被全面检验。其实西方主流神学界和哲学界从来知道这点。早期科学家们，包括上述三位，本身就是优秀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

更是一代理性主义哲学宗师。但直到今天，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学界主流、和大多数普通人，还没理解这点，普遍以为科学已经证伪了创世主。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包括宇宙大爆炸理论，逐步被验证，机械宇宙观破产，印证了上述几位人类思想巨匠的先见之明。

再看胡适在 1923 年发表的“新十诫”。我曾总结机械宇宙观崩溃过程【10】。1901 年，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时引用了量子概念。1905 年，爱因斯坦在研究光电效应时也采用了量子概念，并创立狭义相对论。量子概念和相对论都违背机械宇宙观。1913 年，玻尔创立量子化原子模型。1915 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在理论上抛弃了机械宇宙观，等等。基于阿奎那在 13 世纪提出的神学思想，西方主流学术界认为，神学和哲学必须关注科学最新发展，不可违背被确认的科学事实。胡适自 1910 年到 1920 年代初在美国留学十几年，期间自 1915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专业博士。哥大位于纽约市，是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当时各种学术思想聚集和交融，名家云集，信息灵通。按理，年轻学者，尤其在读博士生，对世界最新学术发展有责任保持敏感。但从胡适新十诫的内容和语气看，他完全不知道机械宇宙观正在崩溃，对科学最新成果无知无感。

胡适对西方主流哲学的很多基本观念也无知。自 2500 多年前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开始，包括后来多位大师如柏拉图和康德等，都严肃论述过，人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在本质上不可靠，只是幻影。科学属于人的感知范畴。休谟发现科学方法论中存在无可逃避的逻辑漏洞，所以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算真理，只是还没有被证伪的假说【22】。在 20 世纪初，这些知识已是西方大学哲学系本科阶段的内容，但胡适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查今可以知古。即使在留学期间，胡适依然想着回国后的前途，如何向上爬，所以他忙于找个人出路、拉关系等。他混迹于海外华人中间，专注中国政治，只把学术看成敲门砖，心不在焉。自明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包括百年来历代留学生，心态都类似。胡适后来的人生经历佐证了这点。他对现实政治，尤其个人如何在乱世中自保和晋身，特别精明，深思熟虑。比如 1949 年政权交替时，他选择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而是跑到美国保自己平安。多年以后他看到台湾稳定了，才去台湾养老，享受公款支持的养尊处优待遇。在个人进退之外，对于真理、世界本源等核心哲学问题，他从没真在乎过，也就没什么真知灼见。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顶级知识分子，几乎都如此。胡适虽然不堪，还是远好于平均水平。中国思想界水平之低下、人心之堕落，让看清楚的人咋舌。

回到西方思想史。在相对论和量子物理诞生之前，少数激进学者惊艳于科学的进步，认为科学的巨大成功证明了科学的基础，机械宇宙观，就是真理，于是开始怀疑神。从 17 世纪中到 19 世纪末，他们组成了一个跨越两百多年的松散哲学分支，其重要成员包括斯宾诺莎、休谟、卢梭、边沁、马克思等，其思想最初也源自基督教义，但后来渐行渐远，最后催生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下将逐一介绍这几位哲学家和他们的观点。

斯宾诺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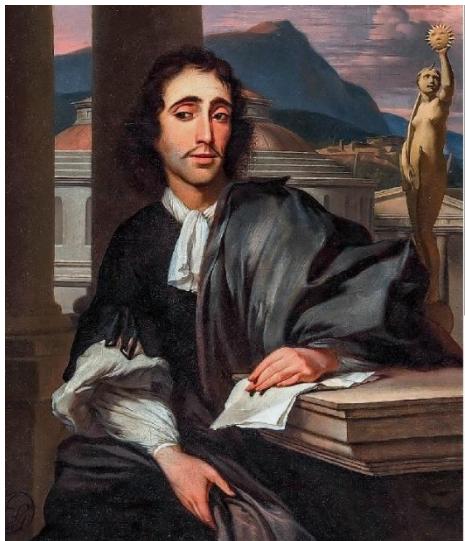


图 24.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 近代荷兰哲学家, 比笛卡尔年轻 30 岁, 晚于伽利略, 早于牛顿。他在世的年代, 中国明清交替。他与郑成功、顾炎武等人同时代。左, 他的画像; 右, 他被驱逐出犹太教会的情景。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 家族经商, 殷实但不算大富。他儿时聪慧, 接受严格犹太教神学教育, 原希望成为拉比。但成年后他醉心于自由派思想和理性主义哲学, 23 岁时因言论被犹太教会驱逐, 搬出犹太社区。他不再可能成为拉比, 改行以制作光学镜片为生, 业余研究哲学。当时镜片制造是高科技, 收入高, 受人尊重。他生活简朴, 自律严格, 像个圣徒。他去世时才 44 岁, 但已名声远扬。他的多部重要著作在死后由热心朋友张罗出版。

斯宾诺莎生长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当时荷兰以开明著称, 从欧洲腹地和英伦三岛来的各种新思想在这里碰撞和交融, 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都混杂于此, 犹太教也很活跃。犹太人保持民族聚居, 类似今天广州城里的黑人区。斯宾诺莎从小接触各种宗教、教派、新科学、新哲学等, 内心冲突剧烈, 自然而然在思想上货比三家。他精通犹太教义, 但觉得太老旧。他懂得基督教义, 但作为被主流基督教文化排斥的少数族裔成员, 他对基督教有抵触。他向往新兴科学与哲学, 觉得那才是未来发展方向。

“现实与神是一回事”



THAT ETERNAL AND INFINITE BEING WE
CALL GOD, OR NATURE [DEUS SIVE
NATURA], ACTS FROM THE SAME
NECESSITY FROM WHICH HE EXISTS.

- BARUCH SPINOZA -

那个永恒、无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神或自然。
神的存在和自然的运行本是同一个必然。

-斯宾诺莎-

图 25. 斯宾诺莎的名言，“那个永恒、无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神或自然。神的存在和自然的运行本是同一个必然。”

斯宾诺莎认为，既然宇宙是永恒且无限的，神也是永恒且无限的，而永恒且无限的东西只可能有一个，那么神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他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招牌口头禅是 Deus sive Natura。这是当时学术主流语言拉丁文，直译为“神或自然”，意思是“神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他的思想属于泛神论。同时代很多人认为他离经叛道，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从来坚定维护神，从未怀疑过神存在，经常把神作为自己论点的基础。在生活中他对神非常虔诚。

无神论者不容易理解“神是自然”的观点新在哪儿？为什么主流基督徒认为斯宾诺莎离经叛道？传统教义认为，神完美，但神造之物都不完美。神头脑里有完美计划，神按这些计划创造万物。万物一旦被造出来，就开始堕落，偏离神的计划，变得不完美。堕落就是偏离神意。人也如此。神造人之后，人有了自由意志，开始违背神意，例如亚当偷吃苹果。

这套经典基督教义符合古希腊主流哲学。柏拉图认为彼岸世界是个理想世界，包含万物的完美模样，比如完美的“椅子”概念，它永不破损。现实中万物是这些完美模样的不完美复制品，比如现实中的椅子都体现“椅子”概念的一些特征，但都有偏差。时间久了，现实中椅子都会破损等。历史上，基督教哲学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哲学。

斯宾诺莎认为“神是自然，自然是神”，隐含现实世界也完美，于是重新引爆自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就面对的很多根本问题。比如“现实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丑恶？”、“人为什么做坏事？”等。基督教已解决了这些问题。世界里有丑恶、人会堕落，都因为背离神。神是完美、万能、全知的，但神并不控制一切。比如神给予人自由意志，拒绝控制人如何选择，

人于是经常经受不住现实世界诱惑，违背神，犯下罪恶；现实中的椅子也会自然老旧、破损等，变得丑陋，等等。

与基督教义相比，斯宾诺莎的理论退步了。如果现实世界就是神、也完美，人被现实诱惑，就等同于被神吸引，屈服于现实就是服从完美的神，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罪恶与丑陋？唯物主义者和效益主义者们用一生追求现实利益，结果失去自由，被人奴役。芸芸众生痛苦、贫穷、互相残杀等。这些都表明现实不完美，斯宾诺莎的基本理念错了。

I believe in Spinoza's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in the lawful
harmony of the world, not in a God who concerns Himself
with the fate and the doings of mankind. --Einstein 1929

我相信斯宾诺莎笔下的神。神在按规律和谐运行的世界中展现自己。神并不在意人的行为或命运。

--爱因斯坦，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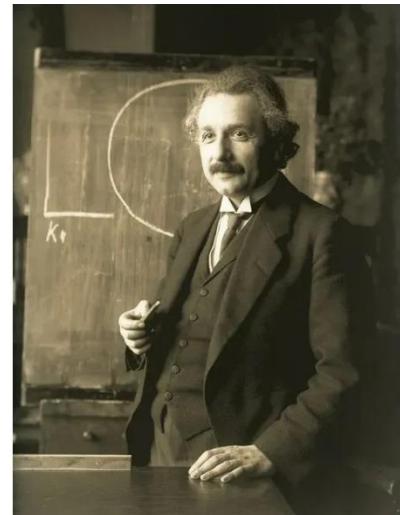


图 26. 爱因斯坦在 1929 年接受采访，被问到信仰，讲出名句，“我相信斯宾诺莎笔下的神。神在按规律和谐运行的世界中展现自己。神并不在意人的行为或命运”。科学研究以现实为准，科学家寻找理论迎合现实，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现实完美而神秘，是思想的终极标准和目的。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基于 17 世纪的科学。不难理解，在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取代牛顿体系之前，很多科学家推崇他的理论。最著名的例子是爱因斯坦。他在 1929 年说过，“我相信斯宾诺莎笔下的神。神在按规律和谐运行的世界中展现自己”。但斯宾诺莎笔下的神与当代科学不兼容。比如根据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现实世界在最微观层次是随机的，运行并不完全按规律，违反逻辑公理“充足理由律”(PSR)，所以不完美。爱因斯坦是相对论创始人，参与创立了量子物理，但一生执着于机械宇宙观，不能自拔，不愿接受量子物理中的一些基本结论。他也是生活在基督教文化圈里的犹太人，虽与斯宾诺莎相隔两百多年，但思想上惺惺相惜。

很多朋友信仰科学，所以爱屋及乌，在重大事务上相信科学家们的意見，比如问杨振宁是否信神，听信爱因斯坦对核武器的看法，好奇居里夫人的爱情观等。其实从历史看，无论整个科学界还是著名科学家个人，对重大问题的判断经常错误，水平还不如普通大众。比如 1950 年代前，科学界在几百年间认为宇宙无始无终，而普通基督徒都知道时空有起

点；爱因斯坦崇拜斯宾诺莎笔下的神，但很多老百姓都看出其中存在矛盾；钱学森鼓吹亩产万斤还太少，等等。说到底，科学家的专长是科学。在科学之外，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有优势。

偏离基督教，自由失去根基

斯宾诺莎认为神与自然是一回事。参看图 14 人心模型，他把两个轴挤压在一起，成了一个轴，人最根本的选择没了，自由意志也就随之消失。在他的时代，最新科学是决定论，所以他的哲学也遵循决定论。他认为万事都是事先决定好的，包括人的所有言行、情绪、思想等，于是他在根本意义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斯宾诺莎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自由只是幻影，是人的幻觉而已。

但斯宾诺莎生活在一个推崇自由的时代。当时欧洲各地宗教战争不断，新教徒们正为信仰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德意志地区有 30 年战争；法国有胡格诺派新教徒叛乱；荷兰有 80 年战争；与荷兰关系密切的英国发生清教徒革命，杀了国王，建立共和，但只过十年就失败了；在北美的马赛诸塞湾，清教徒创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雏形，等等。在斯宾诺莎身边，犹太族群正致力于争取少数族裔自由，他自己则一直在荷兰社会里和犹太社区内部争取思想自由。

虽然斯宾诺莎在哲学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但他观察到自由是政治领域里最强大、对人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他个人强烈支持人的政治自由权利，尤其思想与信仰自由。于是他开始强词夺理，认为即使自由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人的幻觉，人也应该追求，政府也应该尽力保障。他的这套思想其实是胡扯，如果付诸实践也行不通。但它很新颖，让当时很多人感到闻所未闻。

否定了自由意志、同时却支持政治自由，斯宾诺莎不得不重新定义自由。他认为人的言行都由情感驱动。他把人的情感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其中主动情感来自人对自然的正确理解。如人懂得物理原理后，再需要建设桥梁，就有了利用物理知识的动力。而被动情感来自人的肉体，是动物性的，比如愤怒与仇恨。他认为主动情感的根源是真理和智慧，代表神。如果人跟随主动情感，人就升华了，就是“智慧地爱神”，也就是“自由”。如果人跟随被动情感，就是被自身动物性驱使，就是受奴役。后世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延伸了这套思路。

斯宾诺莎：自由就是人跟随主动情感。

(Exp. 28)

斯宾诺莎对自由的定义，其实改编自《圣经》。基督教义认为，人要么跟随肉体，要么跟随神，没有其他选择，包括不可能两个都不跟。人跟随肉体就是被奴役，其中包括人被他人奴役的情况。因为他人奴役你，必然经由你的肉体。人跟随神就是自由，因为摆脱了肉体的奴役。《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代表人找到神就得自由。《圣经》又说，“要像自由人一样生活，…要像神的仆人那样生活”，代表人作神的奴仆就得自

由。在斯宾诺莎的理论里，主动情感体现理性和对神的爱，而理性和爱都是神的特点，所以人跟随主动情感就是跟随神。

但斯宾诺莎同时认为自然就是神，让他的自由定义自相矛盾。自然是神，代表现实与神一样完美。肉体是现实的一部分，低级情感源自肉体。“现实完美”就代表低级情感也必须完美。因为如果不，就代表自然产生了不完美的后果，那么自然就不完美了。有人会反问，神造万物，万物有罪恶，是否代表神也不完美？不是的！因为神是精神，万物不是精神、不是神的一部分。罪恶是万物的性质，不是神的性质。但肉体是自然的一部分，低级情感是肉体的性质。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是严格一元论。

在 17 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会占社会主导地位，战争与社会矛盾几乎都围绕宗教，世俗政府相对次要。斯宾诺莎被所在族群驱逐、作品和思想被禁止，始作俑者都是教会，包括犹太教会和基督教会。所以他讨论政治自由，主要讨论如何抵抗权力泛滥的教会，而不是抵抗政府。这与现代中国人面对的情况非常不同。在他的名著《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设计了新政体，其中世俗政府被赋予巨大权力。按今天标准，完全是专制。他希望专制政府压制教会，然后让个人得自由。在现代人看来，这就像羊不听话，就引狼入室，因小失大，实为不智。

在斯宾诺莎的时代，新思想层出不穷，人心思变。很多人与斯宾诺莎类似，崇尚科学，怀疑神，厌倦古老、费脑的基督教义，渴望摆脱教会束缚，获得更多个人自由。他们推崇他，不在乎他理论中显而易见的矛盾。有人会惊讶，这么著名的哲学家，影响力已延续几百年，对自由的理解怎么可能如此自相矛盾？不幸的是，不但他对自由的理解自相矛盾，他之后所有疑神论和无神论哲学家们都继承和发扬了他对自由的理解，都自相矛盾。现代自由民主基于基督信仰，自由概念基于图 14 中的人心模型。历史一遍遍表明，凡否认神的自由概念都自相矛盾，本质都是胡扯，包括马克思的自由概念。

休谟和卢梭

笛卡尔与斯宾诺莎之后约一个世纪，牛顿科学体系大发展，社会影响力巨大，造成西方知识界更加分裂，反基督教的左派力量壮大。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几乎同岁，曾是朋友，后因性格与观点不合，分道扬镳。前者是苏格兰小地方人，相对老实、诚恳。后者是巴黎大城市人，怪异而冷漠。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世期间，中国康熙、雍正二帝开始禁止基督教，延续百余年，直到马克思成年后才解禁。休谟和卢梭都继承了斯宾诺莎的观点，认为人性根源是情感。斯宾诺莎认为被动情感反映动物性，主动情感反映理性、来自神。休谟和卢梭比他更直接，认为人的基本情感都是动物性的、都属于肉体范畴。

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他与斯宾诺莎一样，心目中的辩论对手是基督教义，如图 14 中描绘的人心模型，但他们都不明说，让很多中国读者摸不到头

脑。在理性时代，全社会推崇理性。基督教认为理性来自神。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就是不承认神的至高无上，是不明说反叛神的反叛神。休谟认为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躲避痛苦，与后来的边沁一样，只是没像边沁那样高度数学化。休谟也相信决定论，认为世上万物，包括人的情感，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人应该有不受社会或他人约束的、只按自己情感行为的自由。休谟的自由观也自相矛盾。



图 27. 自柏拉图到基督教，西方主流思想认为，理性来自神，情感来自肉体，人应该让理性驾驭情感，也就是信仰、主义、理想等主导人的所有感情。休谟提出，情感驾驭理性，人的本质是情感，理性只是工具，为情感服务，与传统相反。

卢梭则认为，人的根本属性是自爱，也是一种情感，与休谟异曲同工。自爱其实就是自私，具体表现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关于自由，他提出新定义：

卢梭：自由就是人遵守自己认可的规则。 (Exp. 29)

这个定义其实也改编自《圣经》。《圣经》对自由的诠释是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其核心是人坚信神、跟随神。具体表现多样，包括

1. 人做神的奴仆，
2. 拒绝肉体诱惑，
3. 不做他人奴隶，
4. 民族解放等。

疑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自由定义都忽视其核心，片面强调某个具体表现。卢梭注意到，《圣经》是人与神在自愿条件下签署的契约，就是一套规则。人成为基督徒，代表他认可这套规则，今后自愿跟随神、获得自由，即使这样做损害他的现实利益。卢梭的自由定义否认神，单独强调这个片面。他认为人遵守任何自己认可的规则，都算自由。

严格讲，自爱是动物性情感，来自肉体。它控制人，但人不能控制它。因此在卢梭的框架下，人没有自由意志。当人决定是否认可一套规则时，人的自爱已经事先决定好了结果，人没有自由可言。就像验钞机检验一张纸币是否伪造，结果由纸币真伪、验钞机使用程序决定，验钞机本身并没有自由选择权。所以卢梭的自由理论存在内部矛盾。

卢梭设计理想社会，其核心不再是神，而变成普遍意志。普遍意志是个抽象法人，代表虚拟的大众意志、追求大众利益。在现实中几乎总表现为国家意志，代表全体公民，追求国家利益。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并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制度，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如缺乏有效抑制手段，必然散伙。卢梭看清这点，制定了一套规则：

1. 国家实行法治，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国家意志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2. 法律由人民投票认可，代表每个人都认可法律，即使他当初投了反对票。
3. 按卢梭的自由定义，人接受法律约束就获得自由。
4. 最关键，对于不愿意接受这种“自由”的人，卢梭说出名句，“人需要被强迫实现自由”(forced to be free)。

以财产分配为例。社会里穷人多、富人少，民主投票通过法律，平分所有人财产。按卢梭定义，富人交出财产就是自由。他们当然不愿意，于是卢梭要求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强迫他们放弃财产。明显，卢梭的新自由定义荒谬，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是个专制社会。

卢梭对基督教传统自由概念做了手脚，偷梁换柱，删除了神。他强调直接民主，要求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都参与政府决策。但没有神的民主不容真正的个人自由。即使他的设计被完美实现，结果也是多数人专制。他去世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他思想为指引，发现他的直接民主设想不可行，必须改动，于是变成独裁【14】。从此，卢梭的新自由概念成了独裁专制的委婉说法。

没有神的民主不容真正的个人自由。 (Exp. 30)

卢梭的自由定义影响深远。在理论界，康德曾引用。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都遵循，比如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土改、中共的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卢梭思想。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大量借鉴法国大革命。这些革命者的惯用套路是以自由为口号获取大众支持，当政后成立橡皮图章式民意机构，以全民名义通过专制法律，然后理直气壮地用暴力强迫老百姓遵守，其中几乎总包含剥夺个人财产。其理论基础就是卢梭的“人需要被强迫实现自由”。

总之，休谟和卢梭对人的理解都改编自基督教义，但他们无视人心中的神，认为人只有肉体属性、或称动物属性。人心因此从二维降格成一维，人的自由意志变得无从谈起，政治自由也成了无本之木。但休谟和卢梭都没有明确否认神，只在学术论述中不讲神。另外，

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和马克思等在中国名声很大，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们反映大多数西方人的心声。其实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极端。西方社会主流从来信仰基督教，疑神论和无神论并没有很多信众。

马克思

休谟和卢梭出生后约百年、边沁出生后 70 年，马克思(1818 - 1883)诞生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家乡特里尔(Trier)位于西欧腹地，原属普鲁士王国，现在德国境内，但离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都不远。他生活的时代，欧洲大陆刚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各种革命依然不断。法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摇摆；德意志逐渐走向统一；英国强盛，称霸世界，在稳定中进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得不对西方开放大门；美国成为健康的宪政共和制国家，虽经历内战，依然向全世界放射着自由民主的希望之光。

犹太出身对马克思影响深远。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欧洲基督教社会排斥犹太教，歧视犹太人。核心原因是犹太人拒绝耶稣。比如大家熟悉的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写于 16 世纪末，其中反派主角就是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作品嘲笑他只遵守合同条文，却没有爱心。犹太教要求人严格遵守一套古老、死板的成文律法。基督教则要人遵循爱的精神，因地制宜处理问题。

进入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多国逐渐变得开明，对犹太人态度缓和，政策从排斥转为怀柔与同化。马克思父母双方祖上都是拉比，在犹太族群里地位很高。但在他父亲这辈，全家利用普鲁士国新政策，皈依主流基督教，放弃犹太教、犹太名字、和犹太传统等，成为标准的普鲁士人。但文化传统深入人心，法律也会反覆，对犹太人的歧视不可能一夜消除。马克思的父亲从小聪慧，发奋学习，由于犹太血统，人生曾遇重大波折，但最终克服困难，成为一名博学的思想者和成功的律师，受到社会尊重。他喜欢康德和伏尔泰，积极参加社会改革运动。

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大学里他本计划学习法律，像父亲那样成为律师。但他开始放荡形骸，荒废了学业。他一生尊重父亲，父子关系密切。1837 年底，马克思近 20 岁，还是个大学生，收到父亲来信。信中一段话反映他父亲对他的担忧和深情：

“哎呀！你行为杂乱无章，没在任何知识领域里花心思。它们通常需要你在昏暗的、发着霉味的油灯下通宵学习。你本应该因此显得邋遢，不在意穿着，没时间梳理头发，并且不合群、拒绝与人说话，甚至不再那么尊重你父亲。但你现在邋遢、不合群、拒绝社交、不尊重父亲等，只因为你啤酒喝得太多。你与这个世界的所有交道都局限于你那肮脏的房间。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你把珍妮(马克思的未婚妻)的情书和你父亲沾满泪水的劝说信都丢到角落里，(不闻不顾)。……你生活得如此没有意义和目的，

“你能取得什么成就？能为你自己和爱你的人带来幸福吗？”——父亲写给马克思的信，1837年11月。

马克思后来转学，放弃法律，改学哲学，并在23岁时，于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景仰黑格尔，参加了当时著名左派激进学术团伙，“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博士毕业后，他本想进入学术界，却没成功，转而成了一名记者和激进左派杂志撰稿人。他奔波于欧洲各地，工作没有保障，收入不高，生活拮据。1848年，他30岁时，大革命席卷欧洲。他与富二代好友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再后的历史，国内学校里都教过，这里无需赘述。

马克思认为神不存在；人就是动物，按财产分成两大阶级；他们为利益发生矛盾，不可调和；无产者为夺财就应该杀人抢劫，然后施行专制。这套理论明确认为，人最终都为利益。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就是效益主义，虽然效益主义者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理论一诞生，西方主流立刻看懂他仇恨社会，因此鄙视和警惕他。这里介绍马克思的身世，希望帮助读者感性理解他。被压迫的人分两类。第一类因为自己受过压迫，所以懂得压迫不对，主张公平对待所有人，如马克思的父亲。第二类自己受了压迫，于是仇恨世人，觉得压迫天经地义，问题只是谁压迫谁，如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是效益主义。 (Exp. 31)

马克思主义违反了基督教道德黄金律，“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在马克思论证过程中，他认为无产者也希望自己更富有，并且不想被杀被抢，包括自己富有后。但马克思要求无产者杀戮和抢劫有产者。他从没说过如果有产者赚钱方式合乎道德和法律，无产者就不应该杀戮和抢劫他。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讲道义。

把人看成动物

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在中国尽人皆知。这个定义包含的基本元素都来自前人，并非马克思原创。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1706—1790)曾写到，“人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Man is a tool-making animal)，早于马克思。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基督教在西欧普及后，西方人都知道人心二元，人的肉体与动物无异。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思想融入主流神学，也认同“人是理性动物”。

但马克思看待人的基本态度与前人根本不同。前人虽然看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处，但更强调二者的区别，认为那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古希腊哲学认为理性是人特有，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动物，因为其他动物都没有理性。阿奎那说人是理性动物，因为基督教强调理性来自神，动物不可能有。富兰克林并非专业哲学家，成长于清教徒文化之中，同时深受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与哲学影响，包括自然神论。他说人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

因为当时人认为制造工具的能力属于理性。其实世界主要文化都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比如中国古人认为人非禽兽。如果说某人是畜生，就是骂他。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无神论、绝对的唯物主义，强调人与动物的一致性。关于理性，他认为所有思想都来自现实，理性本质上也是动物性的，是条件反射的一种，包括数学和逻辑。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用狗做实验，每次喂食时都开红灯。长此以往，红灯一亮，即使没有食物，狗也流口水。结论是动物如同机械，输入决定输出。苏联和中国教科书里都强调这个实验，就是向孩子们灌输动物是机器，人也一样。

在政治生活中，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认为人就是动物，“制造工具”部分显得多余。所以我们有了“争当革命老黄牛”、“要做党的螺丝钉”等官方口号。这种把人当牲畜、当物件的态度，在基督教文化圈里史无前例。达尔文也只是说人来自动物，没敢把人完全等同于动物。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是按神的模样造的，承载着神的高贵与尊严。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应者甚少，只在落后的俄罗斯胜出。但中国文化圈，包括朝鲜、越南等国，人们缺乏基督徒那样的自尊。比如清朝官员穿马蹄袖，见皇上时翻下，形似马蹄，寓意是愿尽“犬马之劳”。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圈里的精英们见怪不怪，顺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定义。

个人不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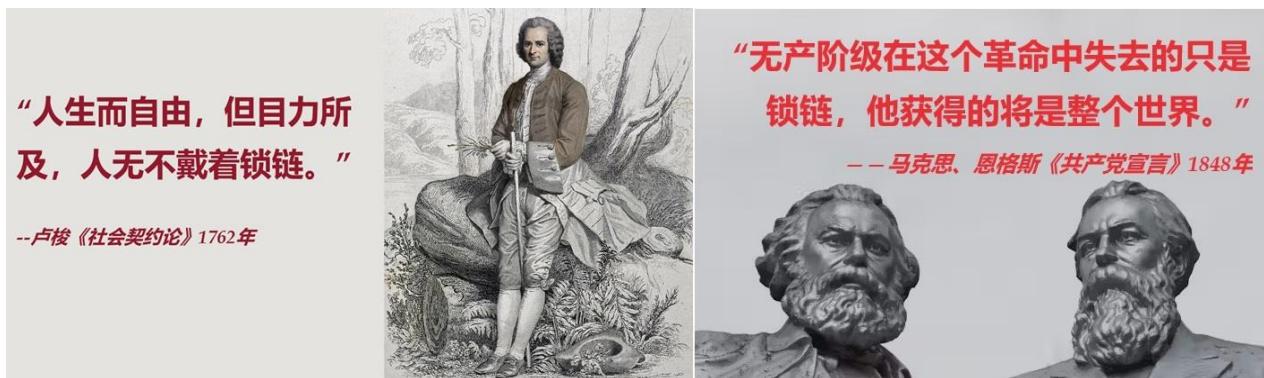


图 28. 卢梭和马克思都用“锁链”比喻人没有自由。源头是《圣经》。比如古老的《旧约诗篇》里有，“祂(神)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脱离黑暗和死亡的阴影，断开他们的锁链”；《以赛亚书》讲到，“我(神)要的禁食是，除去罪恶的锁链”。法国大革命让卢梭名扬世界。他的名句“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无不戴着镣铐”，激励后来数百年里各国革命者为自由而奋斗，包括几代中国人。在 1848 年欧洲大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受卢梭影响，他们也用“失去锁链”来比喻人通过革命获得自由。但其自由的主体不再是个人，而是阶级。

把人看成一种动物、把动物看成只会条件反射的机器、彻底否定神、否认真理与理性来自神，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意识、个人意志、人性、人格等概念就变得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决定论。我们都学过“物质决定意识”原则。既然人的意识被外物决定，哪里还可能有自由意志或个人自由？老黄牛和螺丝钉怎么可能有自由？马克思眼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个人。

但马克思做学问是为革命。19世纪欧洲所有革命都高举“自由”大旗，他无法回避。于是他另辟蹊径，更换自由的主体，从个人变成阶级，就是按财产划分的人群。他之所以想到这点，源头还是基督教。前文讲到，《圣经》中自由的一个表现为民族解放，如《出埃及记》中犹太人集体逃离埃及。马克思的阶级解放与之类似，都是一个群体摆脱另一个群体的奴役。

马克思否认个人层次的人性，包括自由意志，让任何人生观都失去了存在基础。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强调个人忘记自己，转而融入集体，然后在集体存在的意义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个观念在唯物主义者中很流行。比如“胡适的新十诫”中最后一条：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再比如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但是，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意志，群体就更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就像如果单个机器零件都没有自由意志，由多个零件组装成的机器也不可能有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是个小机器零件，那么阶级只能是个大机器。个人融入这个大机器，还是没有自由意志，依然找不到存在意义。马克思的理论、胡适和保尔的豪言壮语等，都没有解决他们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因为他们的无神论、唯物论、决定论思想中容不下人的自由。顾准、林昭、魏京生等人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找到自由民主之路，是缘木求鱼。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宣称相信实用主义哲学。但杜威的实用主义总体属于唯心主义，胡适的思想却极端唯物，里面没有一丝形而上、超越物质的成分，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很接近。比如他的新十诫，每一条都是唯物的。大家都知道，胡适与中共互为敌人。但敌人之间可以很相像，他们的争执只关系利益，他们的本性可以一样。

就是因为胡适、保尔柯察金等这些自以为高尚的唯物主义者们的努力，摧毁了中国和俄罗斯传统信仰，把两国人民带进了独裁专制的深渊。

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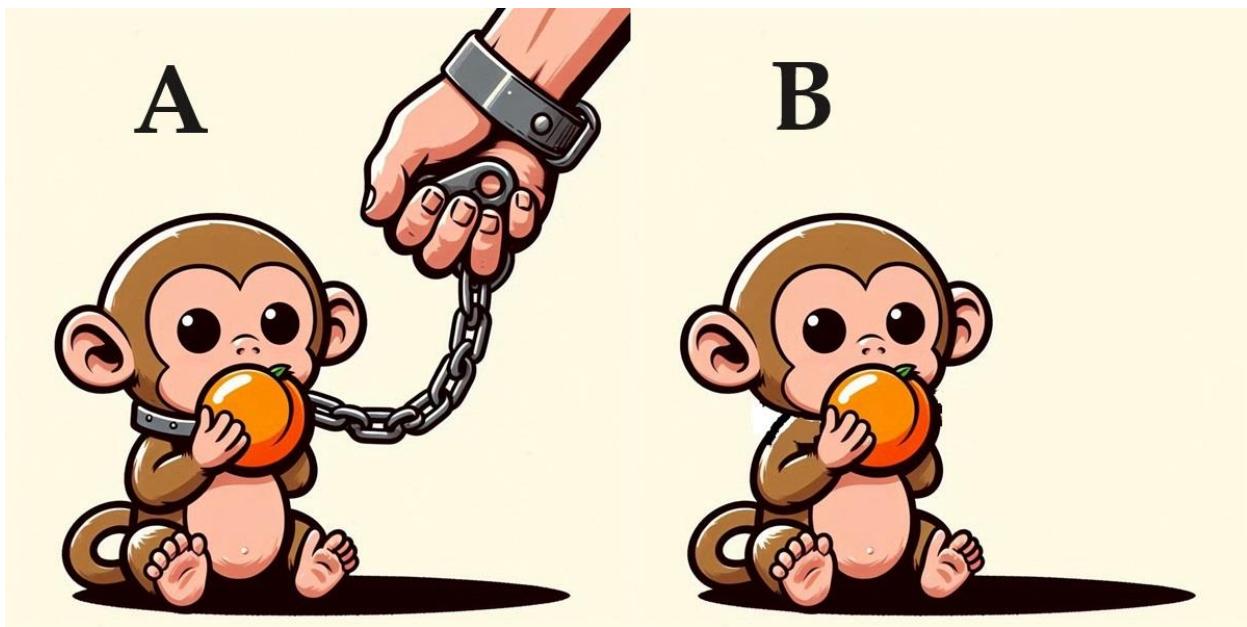


图 29. 对于猴子来说，A 与 B 两种情况没有区别。因为它的终极目的是吃到桃子，只要最后吃到了，脖子上有无锁链都无所谓。效益主义者类似，终极目标是现实利益。只要得到利益，是否有自由并无所谓。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从六四结束到毕业生离校，还有一个多月。期间大家在校方主持下政治学习、写检讨等，同时为毕业分配忙碌。我与其他学生分开，每天早晨到驻校的公安局报到，然后一整天接受单独审查。公安其实是在等待上面命令，决定何时将我收押入监。我也知道，所以气氛压抑。好几个月后才传出消息，中央想放掉所有学生。不过那是后话，当时不可能知道。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们之间有默契，互相不太说话。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小心谈及六四，就可能被官方要求交待，然后对质。我们都想交待对方，也不想被对方交待。所以虽然近在咫尺，我和同学们之间有堵看不见的墙，面对面遇到时互相笑笑，最多说几句琐碎话。

我陷入思想危机。原来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基本想法都被六四冲毁，内心处于崩塌状态，急于重建，又彷徨无助【7】。我沉溺于冥想，大多数晚上我自由，但不愿呆在宿舍。有时在校园里、有时在马路上，一边漫无目的地散步一边思考，很多次从徐汇校园走到外滩再走回来。但深夜里我需要回宿舍睡觉，每次都撞见同学们聚在一起玩牌、打麻将、喝酒等，

天天如此。平时大家也喜欢玩，但那时的频率、时长、参与人数等，都远超从前。次数多了，我逐渐看出门道，同学们的只言片语也印证我的猜测。

那是毕业分配关键期，不确定因素很多。首先，国家对六四学生的态度还不明朗。大家都懂，法不责众，大部分人将没什么事，所以同学们有心情打牌喝酒。但官方肯定要重点打击一批人，杀鸡给猴看。具体是 1%、5%、还是 15%，没人知道。以我们大系为例，毕业班约 150 人，1% 是一两个人、15% 是 20 多个人，区别巨大。同学之间有猜疑，如果谁背后举报他人，自己就可以安全，分配中得到好工作，但被举报人就将倒霉。所以每个人都近乎本能地懂，既不要太积极，也不要落在人后。太积极会招同学恨。未来职业生涯里同学关系很重要。除非万不得已，没必要得罪同学。落在人后，自己可能成为杀鸡儆猴里的鸡，被官方揪出来。到时候自己倒霉，没人帮得了忙。所以最佳策略是藏在众人中间。这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中庸”。

中庸并不容易。当时局势瞬息万变。上个星期喊自由民主，指导员会觉得只是发泄情绪；这个星期再说，就是与中央对着干。两天前在街上与警察打架，警察不敢管；今天哪怕与警察顶嘴，都可能算犯罪。个人如何处置？最简单实在的办法就是扎堆，时刻与周围人呆在一起，按众人言行调整自己言行，让自己保持不左不右，别太先进也别太落后。中庸的精髓是随众人变化而变化，但道义标准是固定的，所以中庸者不能讲道义。扎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同学间猜疑。别人知道自己每天详细行程，就不太会怀疑自己私下与官方接触、举报他人等。这就是为什么同学们天天在一起打牌、喝酒，从早到晚。

中庸本质是损人利己。就像二人同行遇到熊，中庸的人只想比另一个跑得快。群体受压力，中庸者藏中间。他的中庸完全不帮助群体，他的安全以其他人倒霉为代价。如果大家都中庸，最后倒霉的就是人傻的那个，他不懂要随群众变化调整自己。所以中庸者之间崇拜聪明的，就是那种迅速感知、读懂环境变化的，看不起傻的，就是对人和事迟钝的。中庸者们实际奉行的是效益主义，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现实里，他们计算的都是个人得失。面对民族命运转折点，他们喝酒打牌，付出的成本极低，然后就觉得解决了问题，因为达到了自己安全、事业照常发展的目标。而民族未来、国家命运、北京死去的那些年轻人、自己喊过的自由民主口号等，其实都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面对暴政，神的信徒也没有灵丹妙药，经常逃离不信神的人，因为双方无法合作。比如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并没想推翻法老，解放所有奴隶，而只想逃跑，解放本民族。耶稣出生后，犹大王听说有个新王诞生，惊恐和嫉妒之下命令杀掉所有 2 岁以下男孩。耶稣的父亲带领全家逃到埃及，并没试图拯救其他孩子。当然，即使他想，他也做不了什么。在马赛诸塞湾建立自由民主雏形的英国清教徒也是逃来的，没有留在家乡造反。《圣经》说，“你们（信神的人）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两匹马并肩拉车时，需要在脖子上共架一根横木，就是“轭”。

我当时处在焦虑的漩涡里，太多问题没想通，也想不通，心里煎熬。看到周围人喝酒打牌，有时感到诱惑，觉得何必自讨苦吃？大家面对同一个局面，别人在玩闹中就平安度过了，我却惶惶不可终日。我领会到他们的聪明。他们察言观色，窥探身边人言行，揣度身边人心态，然后确保自己恰当、低调地行事，就像那匹靠观察人身体语言就能成功解答复杂数学题的德国马。而我心不在焉，迟钝笨拙。朋友说我藏不住心事，以后必然倒霉，我深以为然。但现在我庆幸当时坚持下来，才更深一步理解了神。大概人都以自己人生选择为傲，我也是。从那时起，我们跨上不同人生道路。同学们融入社会，成为中国主流。我作为基督徒，需要自由，不想做奴才，在中国不可能，只得避走他乡。

上述中庸者们的智慧，那些想好了如何在新文革中保住地位、财产和舒适生活的人的理性，1940年代大学生地下党们计划未来如何成为中国新贵的深思熟虑等，都让当事人不惧怕暴政、独裁专制、和失去自由。他们都是效益主义者，与引言中的非洲猴子、聪明的汉斯等本质一样，都参透人情世态。他们想好了如何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活得好。即使知道将有一批人被不公正对待，他们也不在意，因为别人的命运不影响自己的幸福感。一个民族有特别多这样的聪明人，就很难逃避独裁专制、暴政、和失去自由。这种聪明将人引向通往奴役之路。

《圣经》中有句著名的话，“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讲的就是不以神为基础的智慧与聪明。伟大的宗教改革先锋、16世纪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说过一段出格的骂人话，“理性是魔鬼最大的婊子；从本性和外在表现上看，她都是个让人厌恶的婊子。她是个妓女，魔鬼指定的婊子，是满身疮痍病和麻风病的妓女，应该被践踏和毁灭，……（我们）应该把粪便扔到她脸上，让她变得丑陋。她将，也应该，被淹死在基督教洗礼中……”妓女为利益愿意出卖任何东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精心计算。

路德骂的就是没有信仰作基础的理性。这样的理性让人屈服于现实，成为肉体的奴隶。按卢梭讲法，这种人自爱；按边沁讲法，他们追求现实幸福；司马迁描述他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法家驭民术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他们第一求生存；驭民术第一要素就是霸道，霸者以力，“你不服，我要你命。跪下！”他们第二求发展；驭民术第二要素就是利出一孔，“你要发达吗？要的话就赶快来舔我！”于是这些一心只求过得好、聪明理性的人又跪又舔，都成了奴才。

很多无神论者本能地理解这点。经常听人感叹，“中国人没血性，所以只能作奴才”。所谓“没血性”就是顾忌太多、太算计、太理性。如果人信神、又理性，可得自由，就像马赛诸塞湾的清教徒们。如果人不信神、但理性，只能做奴才，例如穿马蹄袖的清代汉人。无神论者不想做奴才，但不知道信仰的力量，于是只能想到放弃理性。但既不信神、又不理性，代表文明程度不够，甚至就是直截了当的野蛮。如果他们做得小、没军队，就是流氓，比如杜月笙、黄金荣。如果做得大、有军队，就是山贼或军阀，如梁山好汉们，井冈

山上的毛朱，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等。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这类流氓和军阀。他们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无论成败，他们都没能让中国摆脱独裁专制的桎梏。

谈血性，还有一类人不能不提及，就是“孤胆勇士”。如1994年独闯建国门的田明建，本是北京卫戍区警卫副连长，可能因妻子在河南老家被强迫人工流产而死亡，与戍守军队对峙，打死打伤多人后被击毙。北京人杨佳在上海旅游时被警察刁难，他在2008年独自闯入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连杀数名警员，最后被判死刑。2022年黑龙江人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打出标语，公开反对习近平，当场被捕，至今下落不明。当然还有谭嗣同和刘晓波，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但都没看懂中国，错估民情民意，虽有献身精神，却都不能算理性。所有这些人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一般老百姓或公开、或私下里称赞他们勇敢。但冷静看，他们要么死了、要么身陷囹圄，却依然无力撼动专制独裁制度。所以单靠“血性”不能为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也不能改变中国老百姓的整体性奴才地位与心态。

崖山之后无中华

世界上有两股力量，现实与神。二者都吸引人，但神高过现实。当它们互相冲突时，人应该跟随神，舍弃现实中的利益。当代中国充斥无神论者，只知现实，不知神。但中国古人知道现实之外另有一股力量、高于现实，只不过他们不如基督教讲得那么清晰全面。比如宋代邵雍讲，“天地之外，别有天地”，意思是现实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道”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其中“物”指“道”，全句大意是“道”比现实更早，浑沌、寂寞、自在、永恒、做周期性运动，是万物之母。汉代严遵讲，“道德，天地之神明也”。他把道德与神明联系在一起，认为道德来自神明，不来自现实。

但经蒙古人残酷统治后，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崖门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人的最后决战，发生在1279年3月，地点在今天深圳西边，江门市沿海，当时叫崖山。战役中宋军遭受毁灭性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宋少帝跳海自杀。宋军民紧随其后，造成海上浮尸十万余具。蒙古人统治外族，依靠绝对暴力。简单讲，你不服，我就杀你，杀你全家，全族、全城、奸你妻女。蒙元延续近百年后，天灾人祸加宫廷恶斗，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后明随元制，汉族人治理汉族人，骨子里却与蒙古人一样，崇尚绝对暴力。并非只有统治者如此，被统治者也认同。汉人上下不再像祖先那样觉得道和道德等抽象的东西超越现实，转而觉得凡看不见、摸不着的都是虚的、假的、没用的，到最后谁掌握暴力，谁就说得算，哪怕他丧尽天良。这就是近现代中国人特别唯物、特别奴性的源头。不但汉人如此，当年被蒙古长期统治的其他民族也类似，包括俄罗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缅甸人、朝鲜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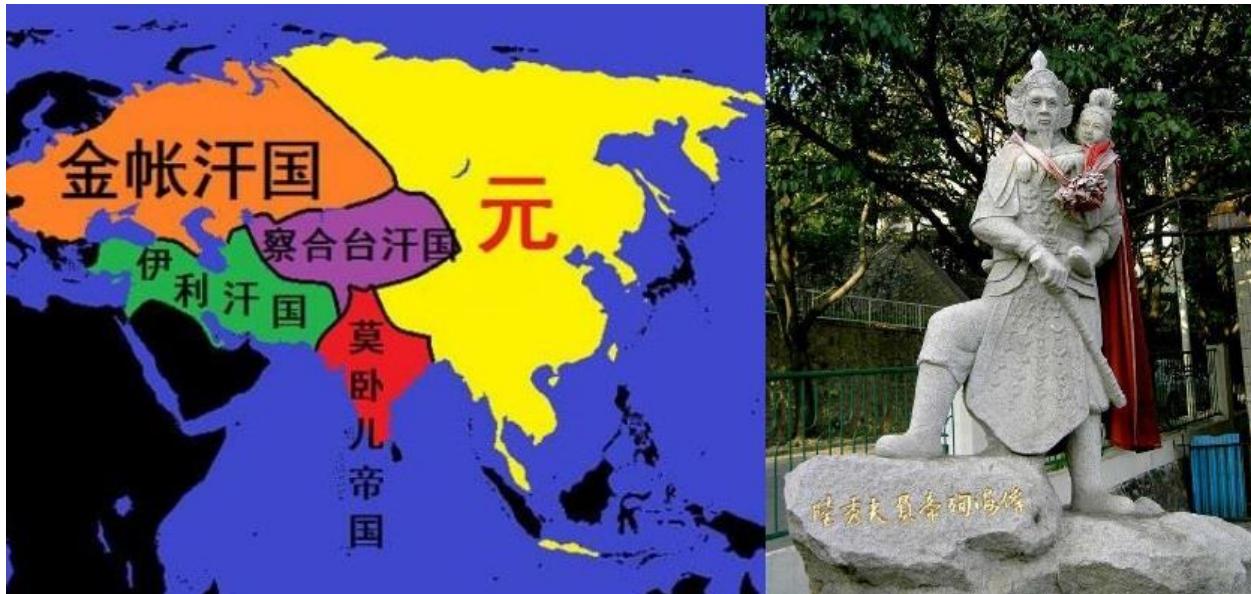


图 30. 左：蒙古帝国大致版图，其中元大致在现代中国、外蒙古、俄罗斯亚洲部分、朝鲜、东南亚等，金帐汗国大致在现代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东欧，察合台汗国大致为现代中亚，伊利汗国大致为现代伊朗和伊拉克，莫卧儿帝国大致为现代印度。这些地方到现代还是独裁专制的沃土。右：陆秀夫负帝殉海像，位于宋少帝陵旁，在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村。有人为塑像披了件衣服。

崖山之后国人思想状态的改变，在元明清时代的文字中随处可见。我在其他文章中讲到过，比如《封神演义》里商纣王调戏女娲、女娲与三尊神辅佐周王、人臣姜子牙分封众神等，都故意颠倒人与神之间的上下关系【8】。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都打不过他，所以他不服玉皇大帝。他服从如来佛，因为如来轻松将他压在五指山下几百年。按理，玉皇大帝和如来都应该以理、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所谓“霸者以力”，世俗君王才以力服人。《西游记》里的神仙们都降格到尘界了。作为对比，基督教罗马教廷在千余年里主导西欧社会，却坚决不设大规模直属军队，不直接攻城掠地，就是因为它坚信真善美、正义、爱等对人心的召唤力比现实中任何暴力和权柄都更强大。这点在现代中国几乎无人懂、无人信。

很多人看不到“崖山之后无中华”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几年前我回国时与老同学谈及基督教。我谈到具体教义时，他闷不做声，中途突然问我，“当初罗马帝国为什么设基督教为国教？”我大致讲了穆尔维大桥战役的故事。在战役前夕，君士坦丁大帝发现基层士兵信仰基督教。为求神保佑，统一军心，他命令手下部队在所有盾牌上画十字架，结果取得胜利。朋友听到这儿，脱口而出，“那不就得了！到头来还是要靠打得过对手！”我一下子领会了他的心态。他判断思想高下，关键看它在现实中是否有效。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值得崇拜的东西必须在现实中最强大，具体表现为能让人获得最大暴力、夺得最高权力。这其实就是《西游记》体现的观念。这个观念至今依然牢牢霸占国人内心，造成他们终极崇拜

暴力和权力。他们认为真理和正义必须依赖暴力与权力，而不是反过来。用西洋哲学语言描述，这是唯物主义和效益主义。用传统中国话讲，这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含义。



图 31. 上左，中国人民崇拜领袖。上右，朝鲜人民崇拜领袖。下，1979 年 7 月 22 日，在伊拉克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代表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首次高喊，“萨达姆·侯塞因万岁”。萨达姆原在党内排名不高。他通过暗箱操作，逼走原总统后第 6 天，突然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他宣布发现党内潜伏外国间谍，然后开始念名字，被点名的人被当众带走处决。与会人员很快意识到，他可以点任何人的名字，也可以点任何数量的人，于是恐惧在会场里蔓延，很多人主动站起身，当众表达对萨达姆的忠心。这样的人一波接一波，最后全体高喊“萨达姆·侯塞因万岁”。

在独裁专制下生活久了，大多数中国人或朝鲜人都忘了自己、或自己的祖辈，为什么对政府和领袖忠诚。看伊拉克人如何突然效忠于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萨达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种忠诚的源头。伊拉克人、朝鲜人、中国人等，对领袖的忠诚大都是真心的，因为他们真心想活命、或活得更幸福。他们经常错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与自己一样，忠诚都因为害怕暴力。其实不然。在卢梭之前的西欧各国坚决维护神作为社会核心，并且相信人民对政府的忠诚基于神对人的吸引力，也就是真善美、正义与爱等对人的吸引力。卢梭把神从理想社会里移除，然后敏锐地发现，政府必须依赖暴力维持人民的忠诚，于是写出名句，“人需要被强迫实现自由”(forced to be free)。简言之，基督徒之间可以依赖神作为社会粘合剂；但不信神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粘合只能以暴力为基础。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汉人传统思想里本来有神、或类似真理与正义的“道”等概念。但因为长期相信“敬鬼神而远之”，认识不够清晰，经常谈不上信仰，或即使信也不坚定。蒙古人一个世纪的暴虐统治夺走了汉人仅剩的那一点“志”，造成整个民族从此特别唯物、特别奴性。在这样的文化里要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必须首先重建民族信仰，让普通人理解，之所以要遵从真理、道德、法律、契约等，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被杀、被打、或现实利益受损，而是因为它们正确。真善美、爱与正义，对人有天然吸引力。人只要坚定相信它们，就可以战胜任何独裁专制，获得自由民主。并且只有如此，个人与民族才有希望。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

中国人远离神的过程，历史上经历三大台阶。一是秦汉时代，最后以“敬鬼神而远之”统一读书人思想。二是蒙元，让国人从心底里认定，暴力最大，神明也必须依靠、追求、和服从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三是中共统治时期，即使民族中最优秀的分子都不再认识神，并把这种无知当作骄傲和信仰。



图 32. 电影《芙蓉镇》中主人公悲壮地说出，“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的瞬间。大众宣传里有个小技巧，无论观点如何荒谬、背后动机如何恶毒，只要让俊男美女充满感

情地念出来，很多人就会认为是对的、好的、有道理。不，人活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像牲口。

中共掌权初期，为巩固统治，借用了秦始皇和蒙元的各种卑鄙手段。电影《芙蓉镇》里只涉及一点皮毛。男女主角在你情我爱中说出了心底里的真话，“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后来很多人正面理解这句话，认为是坚忍不拔的体现。其实它只体现奴隶们的无奈、逆来顺受而已。类似屈原“楚王不听我进谏，我就投江，死给他看”。他们的悲惨遭遇值得同情，他们的应对方式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歌颂。

被压迫的人决心要“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其中包含，“我全听你的，你要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思想，我就那么说、那么做、那么思想”。这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但很多国人都曾如此，不然活不下去，包括文革时我父母、众多亲戚、身边熟人等。这样的人当然不能信神。信神，就要在心里听从神的话，就不可能做到统治者让我干啥我都照办。信神妨碍我做牲口，也破坏我在统治者眼里的完美牲口形象，影响我找工作、升迁、入党入团，如果再来政治运动，还可能被严厉迫害。那样的话，我将不容易活下去、或不可能活得好，所以我坚决不信。

《芙蓉镇》里男女主角结婚，在没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在自家门上贴出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他们自视为狗、自视为黑，只为活命。老百姓的这些表现说明中共成功了，秦始皇和蒙元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目的，聪明和理性的中国人已经看清现实，接受现实，真心承认自己就是动物、活着的最高目的就是活着，先求活下来、再求活得好。这样的老百姓是最好、最可爱的老百姓，因为商鞅的驭民术就是针对他们设计的、对他们最有效。中共的江山从此稳了！国人信奉效益主义、绝对的唯物、坚定的无神论、对神避之唯恐不及，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是被暴力征服的人。中华民族是被暴力征服的民族。

毛去世后邓上台，极端的压迫有了缓和。按理，老百姓有了一些机会，可以不继续做奴才。但是奴性一旦建立就很难去除。思想境界一旦从二维降格到一维，就很难再理解二维。人相信自己就是动物之后，活着只求现实利益，几乎感受不到超越利益的神存在。现在很多人讲，1980年代是最自由开放的年代，1980年代的青年是思想上最自由开放的一代。我们就是1980年代的天子骄子，是最时髦、最难考进的名牌大学、名牌专业的毕业生。关于1980年代青年的内心世界，我有一次生动体会，记忆深刻。

1990年代初，我曾为出国在北京学英文，住在清华校园里，与几位管学生工作的年轻教师相熟。他们大约是1984、85、86级清华本科，都曾是学生干部，毕业后留校做学生工作，同时读在职研究生。清华校风如此，特别看重当官儿，把当学生干部看得非常光荣。他们自认是清华最优秀的一批人。一次深夜谈心，一位讲到自己本科时对西方哲学着迷，长期沉溺其中。按他的原话，“读得没日没夜、天昏地暗，都读魔怔了，但还是觉得似懂

非懂”。他接着说，“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开悟了。去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从此我从魔怔中解脱出来，再不读那些书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

前文讲到，西方主流思想是二维的，包括现实，也包括神。几乎所有西方哲学，无论哪个流派，都在这个二维思想世界里讨论问题。但主流国人是效益主义者，思想里只有现实，是一维的。一维世界里的人很难理解二维世界里的事。什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什么都没有现实生活重要”、“不要为任何身外之物贡献自己”。这位清华仁兄和大多数聪明孩子一样，进大学时人生观已经成型，但不自知。入学后读西方哲学，觉得似乎有道理，但不能理解其中的二维世界。最后只得放弃，重新落入一维的效益主义。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不少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人，但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谁真读懂读通。这话说出来好像极端，却是真实的。一维世界里的人要理解二维世界，首先需要思想升华，但不容易，很少人愿意为之努力，更少人做到了，包括1980年代的天之骄子们。

只注重现实利益、生活在一维思想空间里的人，不理解也不注重独立于现实、独立于利益的真善美、正义、爱，或代表这些东西的神。我的大学同学们个个高智商，很多是各省高考前几名，但进大学后，每天早晨睡懒觉。中学时的数学小天才们不再专研数学，开始学抽烟喝酒打牌，甚至认真学骂人。他们当时就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认为，毕业后进入社会，这些才是重要和必需的能力，数学没用。后来几十年工作经历证明，他们当年对社会的判断是正确的。不到20岁，他们的效益主义人生观就已经发展到很高深的程度，人生计划和对世界的总体看法都围绕利益。他们几乎达到思想自治。

当时也有一批用功读书的同学，起早贪黑，学期结束时互相攀比成绩和名次。但近几年遇见他们，谈起最基本的牛顿定律，当时名列前茅的同学竟然说全忘了。他们当时那么努力，就是为了攀比成绩和名次、毕业后得到好工作等，都是为利益。他们对学的内容本身其实不在乎、没兴趣。可见，1980年代的青年与前辈们一样。知识对他们来说只是追求利益的工具，本质是敲门砖、垫脚石而已。目前，1980年代的青年在中国当政，是各行各业里的中坚，但中国并没有因此离自由民主更近，根源就在这里。1980年代的自由开放停留在表面，没能深入到人的信仰层次。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 《约翰福音》14:6

图 33. 《圣经》记载的耶稣名句，其中“父那里”代表天堂，就是充满真善美、正义与爱的地方或内心状态。当代中国近似绝对无神论社会，古今中外都极少见。即使少数人声称信仰宗教，内心也经常没有神。这为我们理解耶稣的话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聪明、机警的无神论者们秉持效益主义人生观。效益主义就像个骗子，高举“生存”与“发达”两块招牌吸引大众，诱惑他们忘记代表真善美、正义与爱的神。效益主义者们把现实幸福当作人生最高目标，为此费尽心机与力气，最终却成为独裁专制的奴才，失去基本自由与人权；他们的平均生存机率和发展水平也远不如神的信徒们。可见，无神论是谎言、歧途，让人灵魂堕落，让社会变成罪恶和贫穷的地狱。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公元前 63 年，罗马帝国占领耶路撒冷。从此罗马人统治犹太人，镇压犹太人反抗，插手犹太教会，对犹太人横征暴敛。耶稣降世，就是为实现神曾经的保证，成为犹太人的新王，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但耶稣竟然不介入政治，直接讲“凯撒的归凯撒”，意思是“政治都归罗马皇帝管，我根本不管”。为什么？因为神最看重个人。任何社会败坏的根本都是个人的败坏。耶稣要修复的是每个人的内心。

在神与人之间不存在第三者。人远离神、远离真善美、爱与正义等、不认识它们，责任最终全在人自己，任何政治因素都次要。当代中国人追求享乐、功利，对真理正义等只有嘴上支持，实际不感兴趣，造成他们成了统治者的奴隶。中国根本问题在每个人心里，根本出路和希望也在每个人心里。《圣经》记载，耶稣第一次传教时的第一句里就说到，“你们要忏悔！”意思是你们要知错、悔改。然后耶稣遇到一对正在湖边劳作的渔民兄弟。耶稣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来跟着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立刻放下一切，跟随耶稣。人要得救、不再做奴隶，就必须这样义无反顾地追随神。当代中国有这样的人吗？有几个？

2024 年 8 月 1 日

从 3 月中开始准备，原希望在 6 月 4 日前写完，结果延迟了近两个月。

电邮: 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网址: <https://lyz.com> 或
<https://github.com/luotuo123456/lyz>

注释:

1. YOUTUBE, How To Fool A Baboon Into Showing You Where To Find Water, 节选自影片《Animals Are Beautiful People》, Jamie Uys, 1974,
<https://youtu.be/CIRucMlxwM8?si=N-qf8aFqhDcGK40E>
2. YOUTUBE, Trapping a Monkey in Colonial Times (1912),
<https://youtu.be/9jBgo7UipqY?si=NRa687HODNrEZjL>
3. YOUTUBE, New Caledonian crows create compound tools, 新喀鸦制造多部件工具, <https://youtu.be/xcN3WzeKD1E>
4. 骆远志, 2014, 中共与美国在 1949 年的决裂, <https://lyz.com/ccp-usa-1949/>
5. 骆远志, 2015, 文革重来? <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again/>
6. 骆远志, 2018, 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
<https://lyz.com/modern-science/>
7. 骆远志, 2019, 六四 30 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https://lyz.com/64-30years/>
8. 骆远志, 2020, 与无神论朋友漫谈基督教, <https://lyz.com/chat-christianity/>
9. 骆远志, 2020, 中美对抗与文革 2.0, <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2/>
10. 骆远志, 2021,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错了, https://lyz.com/sci_marshall_god/
11. 骆远志, 2022, 缅怀一位交大前辈, <https://lyz.com/sjtu-alumnus/>
12. 骆远志, 2022, 眼下与未来的中国政治主线, <https://lyz.com/china-future/>
13. 骆远志, 2022, 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 <https://lyz.com/democracy-jesus/>
14. 骆远志, 2022, 乱世、治世、与现代民主, <https://lyz.com/locke-rousseau/>
15. 骆远志, 2023, 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到底怎么来的? <https://lyz.com/liberty-bible/>
16. 骆远志, 2023, 自由的人性观基础, <https://lyz.com/human-nature/>
17. 魏京生. 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及其他. 魏京生基金会. 1978-12-05
<https://weijingsheng.org/doc/cn/46.htm>
18. 林昭, 1961, 监狱文集(自由书)《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https://minjian-danganguan.org/uploads/林昭文集.pdf>
19. 王友琴, 2020, 文革受难群体之一: 有宗教信仰的人,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38842>
20. 胡适, 我的信仰,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6476.html>
21. 张雪忠, 2015, 为什么说胡适只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
<http://hx.cnd.org/2015/12/27/张雪忠：为什么说胡适只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

22. 骆远志, 2024, 从巴门尼德到康德---漫谈理性主义哲学,
<https://lyz.com/parmenides-kant/>
23. Meilan Solly, 2018, Crafty New Caledonian Crows Can Assemble Tools, Smithsonian Magazine,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new-caledonian-crows-can-assemble-compound-tools-180970630/>

其他网址，包含读者评论：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DkzNjA4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691006.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57482/202408/220.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rdzn/4950512.html> (旧版本)

https://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1690194&blog_id=493608 (旧版本)